

方寸存真:北堂书的藏书印与藏书签*

赵大莹

内容摘要:由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所搜集和经营的教团图书馆藏书,以北京南堂藏书最为知名。随着历史变迁,以南堂藏书、北堂藏书等为大,各地教堂藏书和一些主教藏书最终汇聚于北京西什库教堂,形成近代图书馆史上重要的北堂藏书,即北堂书。学界对北堂书形成的历史研究和讨论成果颇丰,但揭示北堂书的印章和藏书签等信息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拟将笔者经眼的北堂书藏书印、藏书签的内容和形制加以分类总结,并尽可能地确认这些藏书印的使用年代和用途,以加深对北堂书外观特征的认识;同时辑录与北堂图书馆藏书可能有关的其他教会、机构的藏书印于后,作为认识可能存在于近代北堂图书馆和其他机构之间的文献流动线索,希望可以推进对北京教团藏书整体特征的研究。

关键词:耶稣会士 北堂书 藏书印 藏书签

作为天主教最具学术性的团体,耶稣会在第五任会长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 1543-1615)的努力下,继续发展,面貌“焕然一新”^①,不仅会士数量剧增,而且“耶稣会士撰著作品增多,使耶稣会图书馆更加丰富”^②。耶稣会图书馆,以耶稣会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的图书馆为蓝本,在欧洲各地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古籍数字化工程研究”(项目编号:12@ZH016)阶段成果之一。国家图书馆馆内科研项目“国家图书馆藏中文公教古籍目录提要”阶段成果之一。

① Paolo Broggio, *Strategie politiche e religiose nel mondo moderno: la Compagnia di Gesù ai tempi di Claudio Acquaviva (1581-1615)*, Roma: Aracne editrice, 2004, p. 77. 关于罗马耶稣会教育以及阿夸维瓦的影响,参见黄正谦:《十六、十七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之政治策略及其所传播之宗教文化》,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② Robert Danieluk, *La Bibliothèque de Carlos Sommervogel: le sommet de l'oeuvre bibliographiqu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890-1932)*,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2006, pp. 192-193.

广泛建立起来。其图书馆模式参照安东尼奥·波塞维诺 (Antonio Possevino, 1533-1611)《书选》的描述加以建设,例如藏书室要有一定的高度并且干燥,要朝东向阳;书架首选柏树,用松油涂覆;定期除尘除虫;书籍按耶稣会分类法 (Jesuit Classification) 分成七大类^①。这种“图书馆战略” (Bibliothekenstrategie)^②亦为来华传教士所执行。

来华传教士对书籍的搜集、收藏,乃至图书馆建设,始自明末来华的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龙华民 (Niccolò Longobardo, 1565-1655),尤其是后者,提出了全面的图书馆建设计划,包括北京为中央图书馆和各地住堂为分支图书馆的庞大目标^③。此目标由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邓玉函 (Johann Terrenz Schreck, 1576-1630) 等在欧洲成功的募书之旅而初步达成。“七千部”西书来华,一方面极大丰富了传教士的藏书,为传教工作开

① Antonio Possevino, *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is, in salute omnium procuranda*, Roma: Typographia Apostolica Vaticana, 1593. 按:《书选》以一定分类方法全面地概述了反宗教改革的有关文献,是当时最权威和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高华士详细引用了此书所载的分类法,并介绍了德、匈、法、意、西、葡、波、英等国耶稣会图书馆 17-18 世纪的藏书目录,这些目录可以用于比较当时图书馆所用的分类体系和藏书内容。见 N. Golvers, *Library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1750)*, 2. *Formation of Jesuit Librarie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3, pp. 17-23.《书选》也是耶稣会教育中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参见刘津瑜:《维吉尔在西方和中国:一个接受史的案例》,《世界历史评论》2014 年第 2 期,第 246 页。

② Heinrich Kramm, *Deutsche Bibliotheken unter dem Einfluss von Humanismus und Reformation: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Bildungsgeschichte*, Leipzig, 1938, pp. 93-98. 此书不仅回答了图书馆战略的目的,还分析了耶稣会组建图书馆的基本观点 (pp. 372-373)。转引自 N. Golvers, *Library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1750)*, 2. *Formation of Jesuit Libraries*, p. 10.

③ 龙华民希望这个中央图书馆“可以与任何欧洲最全的图书馆相媲美”,并使“图书馆大部分藏书是拉丁文的”,这样“能够让中国人接近我们的教会”,此建设方案“要在所有住院实行”(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日文献之部档案,JS 113, f°303r, 转引自 N. Golvers, *Library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1750)*, 2. *Formation of Jesuit Libraries*, pp. 10-11. 译文参见《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2 年,第 44 页)。龙华民为北京筹建耶稣会图书馆的计划,还保存在他 1613 年 4 月 23 日为中国教团写的介绍中 (JS 113, f°297v, 转引自 N. Golvers, *Library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1750)*, 2. *Formation of Jesuit Libraries*, p. 11, n.8)。

展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书籍的翻译与介绍,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会通的重要内容。

典籍文献的流传递藏,随着历史变迁多有变动。判定、辨识各种文献的来源,是文献学和书籍史研究的基础内容。某种特殊文献,如历代藏书家收藏或经眼的文献,通常会带有收藏印章和题跋,或者经某位知名装帧匠重新装订而带有一致的物理外观,从而可以将之与其他文献区别开来。

作为天主教图书馆的渊藪——西什库北堂图书馆,至1862年左右已积累了5000余册西文善本,近万册中文文献,其中不乏宋元明善本^①。对今人而言,了解北堂书的基本特征,能够帮助判定哪些文献属于北堂旧藏,大约何时入藏,对深入理解北堂书形成的历史有重要作用。北堂图书馆馆长、荷兰遣使会士惠泽霖(Hubert Germain Verhaeren, C.M., 1877-?)指出“现存北堂书共4101种5133册,其中只有一半多一点,即2281种2855册略有迹可循:藏书家的印鉴或签名,给某个住堂、教团或图书馆的题识”^②,明确指出北堂书富有印鉴信息。但此前学界的研究,除了王冰提到北堂图书馆的汉文藏书印,拓晓堂、沈弘、郭生山、菊秋芳等描述过北京救世堂圆印外,其他形制的北堂图书馆藏书印和藏书签,则较少有学者涉及^③。2006年嘉德秋拍图录内著录了北京救世堂、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章的印文,只说是北堂图书馆藏书章,并未给出对应汉译文及使用年代^④。同样,刘清华公布的23种宁夏图书馆北堂旧藏书的印章印文,也没有给出对应译文及使用年代^⑤。

①参见拙作:《北堂书与汉学研究》,刘玉才主编:《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期,中华书局,2010年,第117-130页。

②H. Verhaere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t’ang Library”,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eking Lazarist Mission Press, 1949, p. VI. 惠泽霖著、李国庆译注:《北堂书史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③拓晓堂:《北堂善本书概述》,《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第3、4期,第110-118,81页。沈弘:《中国究竟有多少“摇篮本”?》,《中华读书报》1999年1月13日。郭生山、王宏霞:《宁夏图书馆馆藏外文教会文献初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1期,封二。菊秋芳:《宁夏图书馆馆藏西方教会文献概述(一)》,《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4期,第107-109页。

④嘉德2006年秋季拍卖会图录《“一千部”西文书籍——从摇篮本到〈北堂书目〉》,中国嘉德公司,2006年。

⑤Liu Qinghua, “The Beitang Collection in Ningxia and the Lazarist Mission Pres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eds.,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20th Century. Unveiling Some Less Known Sources, Sounds and Pictures*, Leuven Chinese Studies XXIX,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 Leuven, 2015, pp. 419-442.

笔者在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到北堂书不同类型的藏书印与藏书签,2014年赴宁夏图书馆查阅1850年以前出版的教会文献(部分来自北堂书),对北堂书的印章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从印文释读的信息,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北堂书在管理权和管理方式上的变迁。本文拟将经眼的藏书章、藏书签的内容和形制加以分类总结,并尽可能地确认这些藏书章使用的年代和用途;同时辑录与北堂图书馆藏书可能有关的其他教会、机构的藏书章于后,作为认识近代北堂图书馆和其他机构之间文献流动的线索。

一、耶稣会中华省玉质印与日本省火漆印

作为传教士和教堂旧藏的北堂书,带有鲜明的西方印章特点,尤其是基督教印章有关的元素。在西方印章中,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大主教印章(episcopal seal)经常是尖角椭圆(pointed oval)^①。历代教皇都有专用的印章戒指,即权戒,图案是耶稣门徒圣彼得。他被视为第一位教皇,因其以捕鱼为业,其教皇印章也称为渔人权戒。印面以拉丁文拼教皇之名^②。由于西方印章通常包括文字和图案(纹章)两部分,故印面布局常以图案(纹章)为中心,文字分上下两排,从左至右环绕图案(纹章),且多为圆形。此外,亦有椭圆形、三角形或方形、菱形或盾形等形状。12、13世纪开始,个人签名在表示信用等用途上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印章逐渐走向衰落,只是在官方机构和部分主教等权力机构中使用。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工商业的发展,传统火漆封印和印章戒指不再适合日常使用需要,于是出现了用金属或橡胶制作的带柄圆形图章,蘸取墨水后加盖在文件上。

笔者所辑的北堂书藏书印,有主教印章和图书馆印章,皆非政府官印,但其形状和用途,却仍有类似之处。如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耶稣会中华省和日本省的印章和火漆印,其形制有圆形、方形、椭圆形等,一些用于档案收藏,一些则是用于公文(如奏折、誓状等),对认识和理解北堂书相关的藏书章,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耶稣会中华省印章(见文末附图1,本文附图均在文末,以下仅标注图号),据著录,其使用时间为17世纪,材质为玉。印纽使用了中国的传统元素——瑞兽造型^③。其印面为正方形,图案为耶稣会典型的元素,中间为“IHS”,“H”上方有十字架,下方有三颗钉子,并且在图案和边线间还有一圈光芒做装饰;四角汉文繁体篆书,为“耶稣会印”四字。

①参见林乾良、孙喆编著:《世界印文化概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②ジェイムズ・ホール(James Hall)著、高橋達史訳:《西洋美術解説事典:絵画・彫刻における主題と象徴》(*Dictionary of Subjects and Symbols in Art*),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4年新装版,第351-352页。

③看造型类似狻猊,为印纽常用的四瑞兽之一。

IHS 或 JHS 为西方基督教的标志性图案,是中世纪欧洲以来拉丁教会和今天许多新教教会所使用的首字母缩写符号,最常见的是“IHS”或“IHC”,为耶稣希腊文(ΙΗΣΟΥΣ, iota-eta-sigma)首字母的缩写,即“ΙΗΣ”,结尾的“sigma”有时候用“S.”来表示。中世纪时,耶稣圣名写作“IHESUS”,因此“IHS”是圣名的首尾字母缩写构成。而17世纪以前,拉丁语中“I”和“J”并无严格区分,因此“JHS”、“JHC”和“IHS”、“IHC”同时使用^①。受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影响,中世纪后期,对耶稣圣名的敬拜被吸收为文艺复兴美术中的常见题材。耶稣会士将“IHS”作为修会标志,取“以耶稣为伙伴(Iesum Habemus Socium)”之意^②,并在“H”上方增加一个十字架,下方增加3颗钉子。钉子本是耶稣受难的象征,最初是4颗钉子,分别钉在双手双脚,中世纪后期许多耶稣受难图像上双脚是一颗钉子^③。三颗钉子还表示“耶稣会士及其他基督教修会成员入会的三项誓愿:清贫、独身、顺从”。有时候十字架上刻着四射的光芒,表示对耶稣的崇敬,这是他“为全人类而死以及他为了爱而忍受死亡所应得的荣耀”^④。这种印章也常常在中文雕版印刷书中出现,如金尼阁所著《西儒耳目资》,在书前序言的署名后即于雕版上刻印了耶稣会圆印和“金尼阁印”方印^⑤。

1773年耶稣会解散,19世纪初重新进入中国,但主要活动在江南地区,其中国教省的印章在形制和印文上有所变化。如徐家汇藏书楼藏香港天主堂印本《天主教教折》卷末所钐方形印章,无装饰图案,印文为汉字繁体篆书,分两行直书,自右向左为“耶稣会/中华省”(图2)。

耶稣会日本教省的印章则为椭圆形、圆形两种形制。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日一中手稿藏品(Jap.-Sin. Manuscript Collection)中的一些信件上,保留了一些17世纪的火漆印,可资比较。年代最早的约为1616年左右使用,从火漆印保留的印面图案(图3)来看,印章带有双边线,外环有珠串和连环鱼的装饰,中央图案为“IHS”,“H”上方有十字架,下方有三颗钉子,十字架和钉子两侧有线条装饰,中央图案和装饰边之间有栏线相隔,无印文。其中的鱼

①Udo Becker, *The Continuum Encyclopedia of Symbols*, New York: Continuum, 2000, illustrated and reprinted, pp. 59-60.

②Jennifer Speake 著,中山理译:《キリスト教美術シンボル事典》(*The Dent Dictionary of Symbols in Christian Art*),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年,第123页。

③《キリスト教美術シンボル事典》,第169页。

④高智瑜、马爱德主编:《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2001年,第13页。

⑤《西儒耳目资》三卷《释疑》一卷,明天启六年(1626)王徵、张问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7340。

(Ichthus),最初是作为基督教早期洗礼的象征,来自希腊语 ΙΧΘΥΣ,作为耶稣(I=Jesus)·基督(Ch=Christ)·上帝(Th=Theou (God's))·圣子(U=Uios (Son))·救世主(S=Soter (Savior))的首字缩略语,常用于印章、罗马地下墓室、石棺等的装饰^①。

图4所示为1619年左右使用的印章,从火漆印保留的图案来看,印面是圆形,双边线,中央图案为“IHS”,“H”上方有十字架,下方有三颗钉子。构图简洁,无其他装饰或印文。

图5则是1620年左右使用的印章,从火漆印保留的图案来看,具备边线、图案、印文要素。该印面为椭圆形,双边线,外环为拉丁文,印文自左向右环形,为“IAPON SOCIET IESV † PROVINCIALISP.”即“耶稣会日本教省”。中央图案为“IHS”,“H”上方有十字架,下方有三颗钉子。外环以光芒。图案与印文之间有栏线隔开。

1720年,燕行使李器之曾参观南堂,拜访苏霖(José Suarez,1656-1736)、张安多(Antoine Magalhaens,1677-1735)、麦大成(Jean François Cardoso,1676-1723)三位神父,对传教士展示西方书写方式及使用火漆印、印章的情形,观察颇为详细:

案上多积书卷,皆以革为衣褐,视乃西洋字也。字样与梵字略通。余使苏霖书之,其笔以鹅翎成,雕羽茎根,斜削使尖;水晶小缸,以绵濡墨,蘸其笔而书之。一蘸五六行,墨不干。其书自左旁行书之,乃《大宛传》所谓草书旁行者。西方之书,大抵如此。运笔神速,如飞行,如引绳……桌上多置朱红钉,大如笔管。问何用?则使从人燃烛来。烛细如指,盘曲如面,长几十尺,随手屈伸,似非蜡烛。其人以朱钉头烧于烛上,钉即着火。乃以钉头火点纸,折而封之。再点后以小铜印印之,朱字即分明。问此印何用?答书札及其他封识处皆用此云。^②

其“朱红钉”即火漆,其用途为配合铜质印章为书札等封识。韩琦提到北堂藏《算法纂要总纲》底本之一有耶稣会士苏泛际(Francesco Maria Spinola,

①《西洋美術解説事典:絵画・彫刻における主題と象徴》,第138页。

②李器之:《一燕庵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1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5-296页。

1654-1694)火漆红印^①。此书目前笔者未能亲见,但以用途言,将火漆印盖在书上是比较少见的。

上述印章之材质、印纽及构图与笔者所见的北堂藏书章具有相似性。以下就笔者所见,逐一介绍。

二、教团及其图书馆藏书印

1. 耶稣会 IHS 圆印(约 1726-1785 年)

在一些汉文古籍上,笔者发现带有耶稣会标志的白文圆形印章。有三种形制。其一较大(以下简称 IHS 大印),直径约为 3.9 厘米,白文,无边线,印文为“IHS”,“H”上方有十字架,下方有三颗钉子。第二种是白文印章(以下简称 IHS 圆印),宽约 1.8 厘米,高约 2 厘米,边线为白线,中间为“IHS”,“H”上方有十字架,下方有三颗钉子,并且在图案和边线间还有一圈光芒做装饰。第三种直径为 1.5 厘米左右(以下简称 IHS 小印),边线为白,中间为“IHS”,“H”上方有一个较大的十字架,下方有三颗钉子做装饰。IHS 与十字架的构图,亦见于在华耶稣会士的墓碑之上:自 1757 年去世的汤执中神父起,除了重刻的 1768 年去世的王致诚墓碑外,所有耶稣会士的墓碑上都刻有这个标志。首位葬在正福寺墓地的遣使会士韩纳庆(Robert Hanna, 1762-1797)神父墓碑上使用了这一标志,其他遣使会的神父一般不用^②。

这三枚印章亦会同时出现于一书之上,如清刻本《超性学要》之《复活

①韩琦:《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以安多和〈算法纂要总纲〉的编纂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146 页注 1。按,韩文指出北堂图书馆的《算法纂要总纲》(*Synopsis mathematica complectens varies tractatus quos huius seientiae tyronibus el missionis Sinicae candidatis breviter et dare concinnavit P. Antonius Thomas, è Societate Iesu ... Duaci, Typis Michaelis Mairesse, 1685.*)有两个复本,其中一种带火漆印。惠泽霖编《北堂图书馆西文善本目录》(以下简称“惠氏目录”)著录编号 2941,排架号 550。目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行文方便,以下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接收的北堂西文善本书按“专藏缩写、惠氏目录著录编号/排架号”三项著录,如本书为 BT No. 2941/550)。另一种为葡萄牙耶稣会士苏霖(José Suarez, 1656-1736)所赠,现亦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BT No. 2942/494)。根据惠氏目录,第一种(BT No. 2941/550)第一册有递藏信息“P. Verjus Franco MacSpinola.-Collegij Soc. Jesu Pekini.”即“苏泛际——北京耶稣会学院”;第二册著录葡萄牙文题识“Da V Provincia da China pertence à Igreja de Hoai Ngan”,即“属于中国副省淮安教堂”。惠氏目录未言此书中有火漆红印。第二种(BT No. 2942/494)第一册亦有“属于中国副省淮安教堂”的葡萄牙文题识;第二册则带题识“Ex donopr Joseph Suarez.-Fuaapplicado à V Prova da China.”即“苏霖神父所赠——中国副省登记”。

②明晓艳、魏扬波(Jean-Paul Wiest)主编:《历史遗踪——正福寺天主教墓地》附录三《墓碑及拓片上的基督徒标志注解》,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260 页。

论》卷下^①，封面即同时钤有此三印（图6）：自下而上依次是 IHS 圆印、IHS 大印和 IHS 小印，前两印位置在中右下，IHS 小印在右上方。而此部《超性学要》的卷端页则有蒙古遣使会墨印一枚（图7）。

这三种印章皆为汉文古籍上所见，与蒙古遣使会印章常常同时出现，说明应该是在蒙古教区的耶稣会士的旧藏书。如国图藏清抄本《教要或问》，除了封面同时钤有上述三种印章且印章排列顺序相同外，在卷端页另有印章两枚，天头为 IHS 圆印一枚、右下角有蒙古遣使会圆形墨印一枚。

西湾子村（今河北崇礼县）是中蒙古教区最古老的天主教村落，《拳祸记》载：“蒙古初无教友。后有直隶教友数家，不知何年，迁往其地。或以耕田谋活计，或避朝廷禁教之令。北京教士，间时一往巡阅，籍行教礼。”^②据宝贵贞等的研究，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该村第一位教民张根宗领洗^③。雍正开始的百年禁教期间，西湾子成为天主教徒避难地，他们“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建了一座小堂……不引人注目，他们能自由地到那里聚会”^④。到 1726 年，该村已有 100 多人入教，并建有一个小圣堂，教民由北京教区管辖^⑤。

1773 年，罗马教皇克莱门十四世（Clement XIV，1705-1774，1769-1774 年在位）发布《我们的上帝和救主》（*Dominus ac Redemptor*）通谕，解散了耶稣会。1775 年 11 月北京耶稣会士接到了正式通知^⑥。在京耶稣会财产（包括藏书）引起了葡萄牙国王、教廷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754-1793，1774-1792 年在位）的激烈争夺，与此同时，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趁机霸占耶稣会士的财产，一些耶稣会士也试图将集体财产据为己有，各方斗争十分混乱。部分在京耶稣会士开始向西湾子转移藏书，如北堂法国耶稣会神父孙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1695-1767），他在发愿文背面写有北堂所藏遗物目

①利类斯：《超性学要》三大支，安文思：《复活论》二卷，清北京天主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138649。

②李秋：《拳祸记》下编《增补拳匪祸乱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9 年，第 274 页。

③宝贵贞、宋长宏：《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第 145 页。

④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26 年 7 月 26 日于北京，杜赫德编、朱静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3 卷，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 203 页。

⑤张彧、汤开建：《晚清圣母圣心中蒙古教区传教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16 页。

⑥Alphonse Favier, *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Péking: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au Pé-Tang, 1897, p. 219.

录,系为转移藏书等财产而做^①。1783年,传信部命遣使会接管中国传教工作。当时遣使会所管辖的区域有蒙古西湾子、河北、河南等省。但此番财产争夺的问题,随着葡王任命的北京主教、方济各会士汤士选抵达北京而宣告结束。1785年1月19日,汤士选抵京后,根据南堂、东堂前耶稣会士的意见,解决了传教士之间的分歧,逐步统管了北京各传道会的大量财产^②。1785年4月29日,法国遣使会会士罗广祥(Nicolas-Joseph Raux, 1754-1801,亦称罗尼阁)、吉德明(Jean-Joseph Ghislain, 1751-1812,亦称冀若望)和辅理修士巴茂正(Charles Paris, 1738-1804,亦称巴加禄)入华。同年,罗广祥在北堂建立中国第一座遣使会住院,开始向河北、蒙古传教^③。

所以这三枚印章应该是在西湾子教会中的耶稣会士所使用,时代约在1726至1785年之间。

2. 法国遣使会长方形印(1785-1827年)

法国遣使会印,形制为长方形,高约3厘米,宽约5厘米,四个角有百合花形装饰,中间有字母“S”和“V”变形组成的图案,印文为拉丁文,分上下两部分,自左向右环形,文曰“EX. Libris P. P. GALLORUM./Cong. Missionis”,意即“遣使会高卢神父藏书票”,属于法国神父所有。字母“S”和“V”组成的图案,是遣使会图章构图之一。这种艺术化的设计与圣徒有关,例如SJ是圣·若瑟(Saint Joseph),SL是圣·拉匝禄(Saint Lazare)。这种设计也用于教堂石刻的装饰之中,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比较流行。SV的图案也用于书籍的题名页、房屋印章,今日的巴黎圣母小教堂(La Maison mère)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亦有应用^④。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十三通遣使会士墓碑上,有八通带有这一标志,位于十字架图案下方^⑤。

①此发愿文为裴化行旧藏。见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vol. 2,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934, p. 723.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749页。

②Georges Mensaert, *Les Franciscains au service de la Propagande dans la Province de Pékin, 1705-1785*, Florentiae: Typographia Collegii S. Bonaventurae, 1958, pp. 280-285. 阿布雷沃:《最后一批葡萄牙耶稣会士在北京的财产》,《文化杂志》(澳门)第40、41期,2000年,第159-160页。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vol. 2, pp. 935-945.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990-1000页。

③张多默:《遣使会与天津教区(1912-2012)》,杨小斌主编:《津世之光:百年恩典福传研讨会论文集》,天津教区益世编辑部内部出版物,2012年,第25页。

④John E. Rybolt, C.M., Ph.D. “The Emblem and Motto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Vincentian Heritage Journal*, vol. 22: Iss. 2, 2001, p. 146.

⑤《历史遗踪——正福寺天主教墓地》附录三《墓碑及拓片上的基督徒标志注解》,第261页。

此印见于北堂图书馆法文书《数学天文学观测》题名页^①,同页此印章左侧有“北京救世堂”圆形朱印,但经水渍,印文漫漶,印色变浅。该书题名页头头位置还有墨笔题识,为拉丁文横书一行:“Missionis Sinensis PP. Gallor. Soc. Jes. Pekin”,即“北京耶稣会教团高卢(法国)神父”。因此是书为法国耶稣会神父所有,时代应为1690-1785年,之后由法国遣使会接管。该书编者为苏熙业(Etienne Souciet,1671-1744)。据惠泽霖编《北堂图书馆西文善本目录》(以下简称“惠氏目录”),此书有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神父的亲笔订正^②。宋君荣与苏熙业之间有较为频繁的通信关系,此书应经宋君荣请求而来。例如1728年,宋君荣曾将所撰《元史略》寄给苏熙业,同时寄送了两幅地图以供参考^③。

遣使会(Congregation de la Mission),1625年由法国神父圣文生(又称“圣味增爵”,Vincent de Paul,1581-1660)创立,是天主教的国际修会之一。其传教方法与耶稣会不同,以派遣会士到乡间向穷人们传教为宗旨,会士们都从事实际的传教工作,被称为“遣使会”。因其第一座会院建立在法国巴黎拉匝禄教堂(前身为麻风病院),亦称“拉匝禄会”(Lazaristes)。1699年,意大利籍遣使会会士毕天祥和德籍遣使会士穆天尺(Jean Müllener,1673-1742)受罗马传信部派遣,来到中国,进入四川传教。1711年,意大利籍遣使会士德里格(Teodorico Pedrini,1671-1746)入华,并创立了传信部直属的教堂——西堂。1783年教廷传信部命遣使会接管中国传教工作。当时遣使会所管辖的区域有蒙古西湾子、河北、河南、湖北、浙江、江苏、江西、四川、贵州等省。耶稣会解散后,在华法国耶稣会士财产由法国遣使会于1785年接收,此后还俗的耶稣会士在北堂的住院与遣使会士住在一起,直至1814年耶稣会全面恢复。此印章应该为接收财产后加盖,用至1827年北堂关闭。整个遣使会接管期间(1785-1838,1860-1958),从欧洲到中国的书籍搜集与流传仍然没有停止,保

①全名是《数学天文学观测:来自地理志、编年史尤其是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新观测的结果》(*Observations mathématiques, astronomiques, géographiques, chronologiques et physiques, tirées des anciens livres chinois; ou faites nouvellement aux Indes et à la Chine, par les Pè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aris: Chez Rollin, 1729. BT No. 654/225)。

②H. Verhaeren,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 177.

③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vol. 2,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934, pp. 674-675.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92-693页。

留在北堂书中的仍有 14 种^①。

此印章使用年代约为 1785–1827 年。

3. 北京救世堂图书馆图印(1862 年左右)

北京救世堂图书馆印,形制为圆形,直径约为 4.5 厘米,外环以珠饰,中间

①如来自(1)“蒙古遣使会藏书”(Ex libris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Domûs Mongoliae)一种:Joseph Marie Amiot, *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 François composé d'après un Dictionnaire manchou-chinois*, Paris: Imprimé par Fr. Ambr. Diot l'aîné, avec les caracteres gravés par Firmin Diot son 2^d fils, 1789–90 (BT No. 37/3392)。(2)“巴黎遣使会藏书”(Bibl[iotheca]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Domûs Parisiensis)两种:Jean-Baptiste Elie Avrillon, *Sentimens sur l'amour de Dieu, ou Les trente amours sacrés Pour chaque jour du Mois*, Paris: Chez la Veuve de D. A. Pierres, 1763 (BT No. 54/2256)和 Martin Pallu, *De la charité envers le prochain: ses motifs, ses devoirs, les defaults contraires*, Paris: Chez Durand [et] Charles-Pierre Berton, 1778 (BT No. 543/2005)。(3)“中国遣使会藏书”(Ex libris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Sinae)三种:Etienne Souciet, *Observations mathématiques, astronomiques, géographiques, chronologiques et physiques, tirées des anciens livres chinois; ou faites nouvellement aux Indes et à la Chine*, Paris: Chez Rollin, 1729 (BT No. 654/225); Louis Tronson, *Examens particuliers sur divers sujets, propres aux ecclésiastiques, et a toutes les personnes qui veulent avancer dans la perfection*, Première partie, Lyon: Chez B. Compagnon, la veuve Tomas & L. Declaustre, 1700 (BT No. 687/3419); Saxouiensis Ludolphus, *Vita Christi Domini Servatoris nostri*...Parisii: Apud Michaellem Sonnum, 1580 (BT No. 2132/1828)。(4)遣使会主教田嘉璧(Louis-Gabriel Delaplace, 1820–1884)购藏信息的拉丁文题识(Hic liber fuit emptus Romae, an. 1870, à me † L. G. Delaplace C. M. Ep. Adrian. Vic. Ap. Pekin.)三种:Giovanni Pietro Maffei, *Historiarum Indicarum libri XVI. Selectarum item ex India Epistolarum eodem interprete Libri IIII*...Venetiis: apud Damianum Zenarium, 1589 (BT No. 2139/2059); Giovanni Pietro Maffei, *De vita et morib, Ignatii Loiolae, qui Societatem Iesu fundavit, libri III*...Romae: Apud Franciscum Zannettum, 1585 (BT No. 2141/2950); Álvaro Semedo, *Relaz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 Romae: Sumptibus Hermanni Scheus, 1643 (BT No. 3479/3647, 此书题识带有购书时间、地点、金额和汉文“田主教”: Acheté pour 50 centimes derrière la Chiesa nuovaveille de la Trinité, 1870 Rome, † L. G. D. 田主教);(5)“遣使会某某所用”(Ex libris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ad usum...)四种:Isaac Newton, *Opuscula mathematica, philosophica et philologica*...Lausannae & Genevae: Apud Marcum-Michaellem Bousquet & Socios, 1744 (“Raph. Cic.用”, BT No. 2323/793); Isaac Newton,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Coloniae Allobrogum: Sumptibus Cl. & Ant. Philibert, 1760 (“Raph. Cic.用”, BT No. 2326/792); Alonzo Rodriguez, *Exeritium perfectionis et virtutum Christianarum*...Coloniae Agrippinae: Apud Ioannem Antoriivm Kinchivm, 1657 (BT No. 2606/3646); Francisco-Xavier do Rego, *Tratado completo da navegação que contém as proposições e praticas da Geometria*...Lisboa: Na Officina de Antonio Vicente da Silva, 1764 (“遣使会藏书”, BT No. 3719/1101)。

是类似马耳他燕尾十字架 (Maltese cross) 的图案,印文分上下两部分,拉丁文,自左向右环形,为“BIBLIOTHECA DOMUS S (ANCTISSIMI). SALVATIORIS”,并有小十字架标志分隔开头和结尾的单词。十字架图案下方,自左向右横书“PEKING”。意即“北京救世堂图书馆”。印色为朱红。偶有蓝色印、墨印,较少见。惠氏目录所著录的北堂西文善本书中,绝大部分带有此章。这也是前文述及沈弘、拓晓堂、郭生山、菊秋芳等人先后在论文中举例者。

北堂书中的罗马 1593 年版《论星盘》^①题名页中下方即加盖此朱印 (图 8),该书是利玛窦在罗马耶稣会院学习时代的老师克里斯托夫·克拉维乌斯 (Christopher Clavius, 1537-1612) 作品,带有作者亲笔题写赠利玛窦的墨笔题识。此书经李之藻学习后翻译,主要内容以《浑宪通盖图说》为名,万历丁未年 (1607) 刊刻付印,后收入《天学初函》中。

该印章亦见于 1566 年巴塞尔第二版哥白尼《天球运行论》^②题名页上方 (图 9)。此书经意大利耶稣会士罗雅谷 (Giacomo Rho) 收藏,题名页中下方有罗氏拉丁文签名“Jacobus Rhaudensis”。除了在惠氏目录著录的西文善本上可见此印,在 19 世纪出版的西文书上也有用者,例如 1839 年的《教理学实践》^③主题名页 (half title page) 上即有一枚。另外,此印章亦有墨印者,见《罗伯特百科全书·果树尺寸》一书^④的主题名页下方。

“救世堂”乃是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的“国王数学家”——法国耶稣会士所建。1703 年 12 月落成^⑤。带有此印的大多数藏书,包括上述利玛窦旧藏的《论星盘》,都是老南堂书^⑥。故笔者以为此章应为南、北堂藏书合流存放北堂后,在

① Christoph Clavius, *Astrolabium*, Romae: Impensis Bartholomaei Grassi, ex Typographia Gabiana, 1593 (BT No.1291/189).

② Nicolaus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Libri VI*, Basileae: ex officina Henricpetrina, 1566 (BT No.1385/202).

③ Laurent-Joseph Cossart, *Science pratique du catéchiste, ou méthode facile pour instruire les enfants des vérités de la religion, avec des traits historiques, appropriés à chaque leçon*, Lille: Lefort, 1839. 宁夏图书馆编:《馆藏天主教图书目录》,油印本,1993-2001 年,序号 02848 (以下简称“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关于宁夏图书馆藏部分 1850 年前刊印的北堂书现状,参见拙作《北堂图书馆藏书的分流 (1958 年以后)》,《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12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03-225 页。

④ *Encyclopédie Robet, Taille des arbres fruitiers*, Paris: Roret, 1850.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文书,未编目。

⑤ 《历史遗踪——正福寺天主教墓地》,第 4 页。

⑥ “老南堂书”,主要是指 1838 年俄国教团代管之前的南堂藏书。北京耶稣会南堂藏书始自明末入华传教士的搜集与建设,1838 年由于清政府禁教政策日益严厉,转由俄国教团代管。参见拙作《明末入华传教士与南堂书》,《明史研究》第 15 辑,黄山书社,2016 年即刊。部分老南堂书的装帧特点,参见拙作《精致的馈赠——从装帧看清北京基督教团西文藏书的形成及其保护修复》,《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 年第 4 期即刊。

1862 年狄仁吉 (Jean-Baptiste-Raphaël Thierry, 1823-1880) 神父整理藏书编目时所加盖^①。

4. 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长方形印 (1856-1924/1955 年)

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印,形制为长方形,长约 6.8 厘米,高约 2.5 厘米,印文为法文,分三行或四行自左向右横书,三行印文为“VICARIAT APOSTOLIQUE/ de PÉKIN & TCHE -LY NORD. /Bibliothèque du PÉ -TANG”;四行者印文为“VICARIAT APOSTOLIQUE/de PÉKIN & TCHE LY NORD/ *Bibliothèque/du Pé-t'ang”^②,除最后的“PÉ-TANG”改为小写“Pé-t'ang”,“Bibliothèque du Pé-t'ang”的字号比上面两行文字大,其他内容与三行款一致,意即“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大部分为紫印(图 10、图 11),偶有红印和蓝印^③。其印文情况可对比如下:

表 1 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两款印章印文对照

三行印文	四行印文
VICARIAT APOSTOLIQUE de PÉKIN & TCHE-LY NORD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	VICARIAT APOSTOLIQUE de PÉKIN & TCHE LY NORD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

除了惠氏目录著录的西文善本,此印鉴亦见于现存国图的北堂书《中国运动杂志》^④前护页,印色为紫色。在提善工作中^⑤,笔者看到北堂图书馆 1919-

①此次整理北堂书的简况,有汉译介绍文字《北京·北堂图书馆史略》,署名“约翰·罗杰士(原作)”,刊载于《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1937 年第 2 期,第 111-120 页,其中提到“(孟振生)重建南堂图书馆……在这机会,就把所有的图书,盖入司教座印,Bibliotheca Domus S. S.(Sanctissimi) Slavatories”。笔者认为原作者应为日本上智大学教授劳雷斯(Johannes Laures,S.J.,1891-1959),译文对印章的表述有误。虽然笔者尚未见到劳雷斯著作原文,但这部分内容在其论文的日译本中出现,表述为“怀疑北堂图书馆印是 19 世纪 60 年代藏书在并入新主教座堂时,将该图书馆所有藏书加盖的印章”(ヨハネス・ラルレス撰、小林珍雄訳:《北平北堂圖書館發見の日本耶穌會出版にかかはる七冊》,《歴史地理》第 70 卷第 4 号,1937 年,第 270 页)。劳雷斯另有同名文章发表于《日本文化志丛》,内容增加了关于天文学如《鲁道夫星表》、日本有关善本等内容(“Die alte Missions bibliothek im Pei-t'ang zu Peking”,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2, No. 1 (Jan., 1939), pp. 124-139)。

②笔者所见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 2140 一书印章的印文为四行。

③蓝印见于 Jean François Marie Bertet-Dupiney de Vorepierre, *Dictionnaire français illustré et encyclopédie universelle*, Paris, 1857-1864. 宁夏图书馆藏,未编目。

④Charles de Mutrécy, *Journal de la campagne de Chine*, Paris: Librairie Nouvelle, 1861-1869.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CDS760M99。

⑤西文提善,是国家图书馆对西文书库藏书进行甄选,将 1850 年以前出版的西文书作为善本,加以登记和改换保存方式的一项工作。此外,一些名家专藏,如法国工程师普意雅(Georges Bouillard,1862-1930)的旧藏书、原宁波海关税务司穆麟德(P. 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的旧藏书,也作为特藏加以恢复。

1955年的借阅流通登记簿^①上亦有此印,护页正面中间为紫色印章,背面左上角为墨印。

天主教在中国划分的各个教省大多参照行政地理,北直隶主要是今天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的大部分和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当然也不限于此。1924年12月3日,教廷批准中国教区改名,将“北直隶”改为“北京”。此章所使用的时代,应该主要是1924年以前。北堂图书馆的借阅流通登记簿,最早的登记时间是1919年9月15日,尚在教区改名之前,其印章当为改名之前所加盖,至1924年应该停止使用,但是实际上并未以新章代替,而是一直沿用至1955年2月17日。

5. 蒙古遣使会圆印(1840-1860年)

方豪在培根女中发现的《性理真诠》上有蒙古遣使会藏书章^②。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北堂旧藏中文善本《天学举要》(原题《圣教总撮》)^③和《超性学要》的卷端页(图7),见到同款印章。其形制为圆形,直径约为4厘米,墨印,双线边框,外阔内细,拉丁文印文,分两部分,上方自左向右环形,为“EX LIBRIS CONG. MISS.”,下方自左向右环形,为“DOMUS MONGOL”,印文意为“蒙古遣使会藏书”,中间图案为字母“V”和“S”变形后交织的图案,上方有12颗星星。

星辰,在“新约”中用以作为耶稣诞生的标志:“当黑落德为王时,耶稣诞生在犹太的白冷;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星,特来朝拜他。’……他们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到那星,极其高兴欢喜。他们走进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遂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了礼物,即黄金、乳香和没药。”^④带有十二颗星的冠冕表示救恩历史中奋斗的教会,也有以十二颗星星的图案代表十二使徒(Twelve Apostles)者^⑤。

耶稣会解散后,1785-1864年,遣使会负责蒙古地区教务。1840年底,蒙古

①此借阅流通登记簿尚未编目,蒙史睿见示,特此致谢。

②方豪:《考〈性理真诠〉白话稿与文言底稿》,《方豪六十自定稿》,第1887页。北堂中文书中还有《教要或问》抄本,上亦有蒙古遣使会藏书章,印文同为“Ex Libris Cong. Miss. Domus Mongol”。参见H. Verhaeren, “Notes bibliographiques: Kiao yao hou wen”,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No.357 (1943), pp. 398-404.

③阳玛诺(Manuel Diaz):《圣教总撮》四卷(《天学举要》),红格纸稿本,1册,书号:19513。

④《玛窦福音》第二章第1-11节。

⑤“十二颗星”出自《默示录》第十二章第1节:“那时,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解释参见《キリスト教美術シンボル事典》,第218页。

代牧区成立,法国遣使会士孟振生(Mgr. Joseph-Martial Mouly, 1807-1868)任代牧。1846年,教廷委派孟振生接管北京教区,兼任蒙古教区代牧。1868年,孟振生卒于北堂。1864年8月22日,教廷制定长城以北蒙古地区为比利时圣母圣心会(C.I.C.M.,也称“司各特会”)传教区。1865年,南怀仁(Theophiel Verbist, 1823-1868)率圣母圣心会教士以西湾子为中心,发展蒙古教务。1883年,蒙古东部及西南部各成代牧区:(1)由蒙古中部分出之教区:1922年外蒙成立自治区;原蒙中定名察哈尔代牧区;1924年又改名西湾子。1926年集宁成立监牧区;1929年升为代牧区。(2)由蒙古西南分出之教区:1922年蒙西南代牧区分作宁夏及绥远二代牧区。(3)由东蒙古分出之教区:1922年赤峰成立监牧区,1932年升为代牧区。原东蒙代牧区1924年改称热河代牧区。1946年建立圣统制,各代牧区均升格为主教区,绥远升总主教区^①。

从蒙古教区的变化及北堂书转移西湾子的历史^②,可知带有此章的藏书,是孟振生从西湾子带回北京或圣母圣心会士归还北堂的部分书。印章使用时间是1840至1860年。

6. 西湾子宗座代牧区圆印(1924-1946年)

西湾子宗座代牧区印,形制为圆形,直径为4.3厘米,上方为拉丁文印文,自左向右环形,为“VICARIATUS AP. DE SIWANTSE”,即“西湾子宗座代牧区”,下方印文为汉文繁体,自右向左环形,为“西湾子教区”。印章中心有十字架,内有凯乐符号,左右分别是阿尔法和欧米伽。印色为紫色。

国家图书馆藏《超性学要》目录首页有此印^③。此书有四篇序:高层云序、胡世安序,利类斯自序(顺治甲午孟春),利类斯题序(康熙十五年丙辰孟春)。在胡世安序首页眉上方和目录首页(图12),钤有蒙古遣使会圆形墨印和西湾子宗座代牧区藏书印。

自1726年西湾子开始兴建教堂至1936年的210年间,天主教会在这个村庄先后14次大兴土木,形成了以教堂为主的百馀亩建筑群。以西湾子教堂为中心,西湾子村在1936年成为新设的崇礼县县城。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蒙古三个教区都受到重创。西湾子主教座堂由于防守坚固,教堂和教徒得以幸存。1922年3月14日,中蒙古代牧区更名察哈尔代牧区。1924年12月3日,更名西湾子代牧区。教会发展进入繁荣时期。1946年4月11日,教皇庇护

①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台南闻道出版社,1980年,第32、50、69、79、87、96、118页。

②相关研究,参见:J. B. Thierry, M. Clément trans., “La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29 (1916), pp. 47-50. J. B. Thierry, Théo Rühl ed., “Catalogus Bibliothecae Domûs Pe-t'ang,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Pekini Sinarum 1862”, *Monumenta Serica*, No.4 (1940), pp. 606-607. J. Van den Brandt, “La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 Notes historiques”, *Monumenta Serica*, No. 4 (1940), pp. 616-621.

③利类思译:《超性学要》,北京天主堂清刻本,与《复活论》合刻,书号:138649。

十二世(Pope Pius XII, 1876-1958)颁布“成立中国教会圣统制诏书”,通令中国建立圣统制,将中国划分为20个教省,西湾子代牧区升为西湾子教区,属于绥远总教区^①。

根据西湾子宗座代牧区设立的时间,此藏书章的使用时间在1924-1946年。

7. 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圆印(1924-1946/1958年)

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印,形制为圆形,直径约为2厘米,印章中间为十字架图案,类似坎特伯雷十字架,拉丁文印文分上下两部分,自左向右环形,印文为“BIBLIOTHECA†VIC APOST PEKINENSIS. DOMUS PETANG”,意即“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两段印文之间用十字架符号隔开,有紫色(图10、图11右下角印、图13)和蓝色印(图14)。就笔者所见,钤有蓝色印的书籍多为20世纪出版物,而紫色印则更多见于20世纪以前出版物,似乎蓝色印所用的年代晚于紫色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编书《自然科学的首要原则》^②,其题名页上钤有北京救世堂图书馆红色圆印,而其上加盖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紫色小圆印。显然,此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印章晚于北京救世堂图书馆藏书章,并且此印章的使用,明显带有近代图书馆管理的用途。在一些西文书上,笔者发现,此章只在题名页右下角印上五分之四,而余下五分之一印在后一页上;很多时候,同书的第99页右下角还钤有此章。这种处理方式应该是一种防盗办法。

据北京教区的变动历史,1924年12月3日,北直隶代牧区以主教座堂所在地改名为北京代牧区。至1946年4月11日,教廷设立北京总教区。故此印章启用时间应该是1924年12月3日,下限有可能突破1946年4月,延长至1959年。

此外,宁夏图书馆所藏《圣奥古斯都的忏悔录》^③题名页中间,有“北京救世堂图书馆”圆形朱印,右下方为“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的圆形紫色印,左侧前护页背右上方有墨笔题识两行:“Ex Libris/A. Senain”,显示了收藏者为A. Senain。

笔者在检阅中,也发现了一些书同时带有“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北直隶北堂图书馆”和其他机构或个人的藏书印,显然是北堂图书馆的藏书来源,反映出书籍的递藏轨迹。

①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第69、79、119页。

②Michael Rosset, *Prima principia scientiarum: seu philosophia catholica: juxta divum Thomam ejusque interpretores respectu habito ad hodiernam disciplinarum rationem*, T. 1. Paris: Vives, 1866.

③*Les confessions de Saint Augustin*, Paris: L. Duprat-douverger, 1807. 铅笔编号“SY0001245”。

(1) 法国公共教育部圆印

宁夏图书馆藏《自然科学史》一书^①的主题名页有三枚印章,分别是“北京救世堂图书馆”、“法国公共教育部缴存书”和“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法国公共教育部藏书章,明显加盖于“北京救世堂图书馆”圆形朱印之上。“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长方形紫印亦钤于“北京救世堂图书馆”朱印之上。而此书题名页右下角有“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圆形紫色印,左侧有“宁夏图书馆外文/藏书”章,其中“馆”作“館”。

法国公共教育部藏书章为圆形墨印,双边线,外阔内细,印文分两部分,法文,自左向右环形,作“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中间自左向右横书,作“DÉPÔT LÉGAL”,即“法国公共教育部缴存书”。两部分印文用环形细线分隔。

“公共教育部”(Le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实际是“国家教育部”,成立于1689年12月13日,1790-1824年隶属于内政部。该名称于1828-1830年、1832-1848年7月5日、1863年6月23日至1870年间使用。

此书的钤印顺序可能是:法国公共教育部——北京救世堂——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

(2) 尤金·梅纳尔·彼得圆印

宁夏图书馆藏《恒心问答》一书^②,主题名页上有圆形蓝绿色印,直径约为4厘米,印文为法文,自左向右环形,作“EUGENE MÉNARD PRÊTRE”,并有四朵郁金香花作装饰。中间图案为“I”和“H”组成的标志,外围有两叶蔓装饰,上方有12星王冠,在印文与图案之间有细线圆环和沿圆环分布的16颗六角星。印文为人名:尤金·梅纳尔·彼得。这表明此书曾为尤金旧藏。题名页上方有铅笔写“IIHS”。

此书题名页有三枚印章,从下往上依次是“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圆形紫印、“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长方形紫印,“宁夏图书馆外文/藏书”长方形紫印。

(3) 法国克莱蒙费朗公教图书馆藏书票

这是一种长方形木版印刷的藏书票,边框为连续三角形装饰,印文为法文,分五行自左向右横书:“Librarie/Catholique, /Rue Barbançon 2, et/ rue du Terrail, 12/à Clermont-F.d”。Clermont-F.d为“Clermont-Ferrand”的缩写,故印文为“克莱蒙费朗公教图书馆”。

① Georges Cuvier, baron; T Magdeleine de Saint-Agy, *Histoire des sciences naturelles, depuis leur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chez tous les peuples connus, professée a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Fortin, Masson, 1841. Deuxième Partie. 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 1140。

② J Gaume, *Catéchisme de persévérance, ou, Exposé historique, dogmatique, moral et liturgique de la religion depuis l'origine du monde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Gaume frères, 1845. Cinquième édition. 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 1581。

克莱蒙费朗位于法国中南部,距巴黎 350 公里,是奥弗涅大区的首府和多姆山省的省会,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1731 年,克莱蒙费朗由克莱蒙和蒙特费朗合并而成。其公教图书馆全称是 La Librairie de la Cathédrale,今天该图书馆的地址已经变为 3 rue du Terrail, 63000 Clermont-Ferrand。

此藏书票贴在宁夏图书馆藏《阿尔方斯·罗德里格斯的一生》一书^①的书前固定环衬(封二位置)左上角,主题名页有“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长方形紫印,题名页右侧有“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圆形紫印,左侧有“宁夏图书馆外文/藏书”长方形紫印。显然此书为克莱蒙特公教图书馆流入北堂图书馆,时间应在 1924 年以前。

(4) 维希遣使会修道院、巴黎遣使会修道院椭圆形印

维希遣使会修道院的印章形制为椭圆形,宽 2 厘米,高 1 厘米,印文分两行,上方自左向右环形,为“CONG^{TION} DE LA MISSION”,下方自左向右环形,印文为“M^{ON} DE VICHY”,中间图案为十字架。印色为蓝绿色。印文即“Congregation de la Mission, Monastère de Vichy”(维希遣使会修道院)。

宁夏图书馆藏一册《教会神父》^②,其题名页上有四枚印章。除宁夏图书馆印外,第一为巴黎遣使会修道院之椭圆形紫色印,高为 1.8 厘米,宽为 3 厘米。其边线有二,外阔内细。法文印文,分三部分,上方自左向右环形,为“CONGREGATION DE LA MISSION”,下方为“95, Rue de Sèvres, PARIS-VI^o”,中间为“SÉMINAIRE”。根据印文及地址,此为遣使会在巴黎修道院的藏书章。第二为维希修道院椭圆形印,90°右转后盖在第一枚印章上方,应为注销巴黎修道院印章之用。第三为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位置在右下方。

巴黎修道院还有另外一种椭圆形的印章,见于宁夏图书馆藏《礼拜日和年度重大节日的精简布道实践》一书^③的题名页。形制为椭圆形,两头略尖,宽约 4.2 厘米,高约 2 厘米。墨印,印文分三行,法文,自左向右横书:“PETITE/ BIBLIOTHÈQUE /RUE SÈVRES. 95”,根据地址“95 rue de Sèvres”,应该是巴黎的遣使会修道院的小教堂,地址位于圣母之家(The Maison-Mère)的前面。

①Saintete Léon XII, *Vie du B. Alphonse Rodriguez, frère coadjuteur temporel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Lyon: Pélagaud, 1836.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 2243。

②*Chefs-d'oeuvre des Pères de l'Église: ou, choix d'ouvrages complets des docteurs de l'Église grecque et latine, traduction avec le texte Latin en regard*, T. Douzième, Paris: Au Bureau de la Bibliothèque Ecclésiastique, 1838.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 00099。

③M. Billot, *Proônes réduits en pratique, pour les dimanches et principales fêtes de l'année, avec une table indicative des prônes propres à une mission ou à une retraite. Dédiés à Mgr le cardinal de Choiseul*, Lyon, Paris: Librairie catholique de Perisse frères, 1847.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 2083。

(5) 巴黎遣使会图书馆圆印

有两种印色:一种是圆形墨印,直径约3.5厘米。中间为圣文生(St. Vincent de Paul)立像,拉丁文印文,自左向右环形,为“BIBLIOTHECA CONG^N MIS^N DOMUS PARISIENSIS”(巴黎遣使会图书馆),印文和图像间以细线分隔开。来自巴黎遣使会的藏书,亦有流入北堂图书馆者。如宁夏图书馆藏《尼姆圣母大教堂的殉道者》^①题名页上,巴黎遣使会圆形墨印即被“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圆形紫印所压盖,并且该书用红铅笔将巴黎遣使会的印章勾去,表明注销该印。题名页左侧钤有“宁夏图书馆外文藏书”长方形紫章。

在2006年嘉德秋季拍卖会图录第113号拍品上(图15),笔者亦找到此印,据图录著录,此书还有“北京私立文声学院/阜成门外石门”藏书章,显然是从巴黎遣使会流到文声学院者。其题名页右上方还有书籍分类号“C/276”,中间右侧有墨笔题写“petite Bibliothèque”,即“小图书馆”。

另一种是圆形蓝色绿印,见于宁夏图书馆藏《修女所用全年每日冥思课程》^②。

巴黎遣使会图书馆还有一种椭圆形藏书票,铅印,双边线,外阔内细,印文分五行,为拉丁文自左向右横书,即“EX LIBRIS/CONG. MISSIONIS/DOMUS/ PARISIENSIS/R. DE SÈVRES, 95”(巴黎遣使会藏书/赛弗勒街95号),在“CONG. MISSIONIS”和“DOMUS”中间是字母“S”、“V”组成的图案,中间用双线框长方形留白,用以书写索书号。此藏书票亦见于宁夏图书馆藏《效法基督》一书^③的书前固定环衬(相当于封二位置)上方,索书号为墨笔手写“Q172”,已经用红色铅笔钩涂掉,而题名页右下角加盖“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紫印。

遣使会为在华活动的重要修会之一,19世纪来华的遣使会士主要是法国人。20世纪有许多遣使会传教士陆续从荷兰、波兰、比利时、意大利、美国和爱尔兰等国来华。为了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1902年遣使会在浙江嘉兴设立了浙江大神学院,1909年设立了北京文声学院(栅栏神学院),1920年以后成为主要的区域性神学院。遣使会在北京北堂设立了印刷厂——“北京西什库印字馆”,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徽章是S、V组成的图案,带有格言“Filius sapiens

①M. Mathon, *Le martyre de Saint Baudile, apôtre de Nîmes, suivi d'un recueil historique et d'étuillé sur le sanctuaire et l'abbaye des religieux établis à son tombeau, etc.*, Nîmes: Mme. Veuve Gaude, 1837.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1190。

②François Vauris, *Cours complet de méditations pour tous les jours de l'année: à l'usage des Filles de la charité*, T. II, Paris: A. Le Clere, 1848. 无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仅有sy号,铅笔,手写在题名页上。

③M. L'Abbé F. de Lamennais, *L'Imitation de Jésus-Christ. Traduction nouvelle*, Paris: Ambroise bray, 1868. 未编目,铅笔编号“SY0001488”。

laetificat patrem” (图 16), 即所罗门的箴言: “智慧的儿子, 使父亲喜乐。”^①

除了在华印刷书籍, 在华遣使会士还通过与欧洲本地教团之间的联系, 为神学院购置书籍, 成为 20 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文文献的来源之一。

三、主教及神父印

笔者所见主教印, 以耶稣会巡视员范礼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之印为最早, 为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保留的火漆印 (图 17)。其形制为椭圆形, 中间为十字架、“IHS” 和星星、月亮图案, 以双环线分隔, 外环以连续的鱼形图案装饰, 再以单环线分隔, 最外环以串珠装饰, 并无印文。作为早期的主教印, 与后来的北京主教印章差别较大。

以下是笔者所见北堂书上所钤印或与之有关的主教和神父印章。

1. 索智能主教椭圆形印 (1740–1757 年)

1725 年,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索智能 (Polycarpo de Souza, 1697–1757) 入华, 并于 1729 年作为中国副省的代理人 (procurator) 进入北京^②。1740 年, 他被任命为北京主教, 直至 1757 年去世。

因为是耶稣会士, 他的印章 (图 18) 图案为主教牧徽, 正中的盾徽为耶稣会的标志: 十字架、IHS 和三颗钉子。印章形制为椭圆形, 高约 3 厘米, 宽约 2 厘米, 在印文和中心的耶稣会标志图案之间, 还有象征主教的宽边帽 (galero) 和 8 根流苏 (tassels) 的穗带。印文分两段自左向右环形, 拉丁文, 为 “EPISCOPVS PEKINENSIS † POLYCARPVS DE SOVZA” (北京主教索智能), 两段印文之间用十字架标志隔开。

主教牧徽中的宽边帽源自早期朝圣者戴的一种草帽, 13 世纪里昂大公大会上, 教皇英诺森四世规定枢机们需要带红色的帽子, 于是红帽很快成为通用的牧徽标志。16 世纪, 各种不同颜色和形式的帽子图像用于牧徽之中, 代表持有者在教会中的地位。宽边帽的穗带流苏也成为牧徽中象征地位的符号。由于 1832 年穗带数量才有正式规定^③。因此索智能主教牧徽并不符合教区主教 “左

①《圣经·箴言》第 10 章第 1 节。

②荣振华认为索智能是 1726 年抵达北京的 (耿昇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第 645 页)。但高华士经过查阅耶稣会档案馆的档案, 指出应该是 1729 年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1, n. 141)。

③古伟瀛著: 《主教牧徽中的地方意识》, 《台湾天主教史研究论集》,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8 年, 第 247–290 页。

右各六个分成三行”的规定^①。不过,其牧徽上的十字架则符合在盾徽上方、宽边帽的下方,且为一杠的拉丁十字,后来的规定与之相同。

索智能主教入华前后搜集了的大量西文书。据高华士的研究,索智能的一部分藏书来自果阿主教 Inácio de Souza 旧藏,如《卡莱皮努斯七语词典》^②。1749年,索智能曾赠送给南堂耶稣会学院一部《光学体系四书》^③,题名页上带有其题识“Polycarpus Episcopus Pekinensis Donavit Coll(egi)o Soc(ietatis) Jes(u) Pekin(i), anno.1749”^④,意即“北京主教索智能赠给北京耶稣会学院,1749年”。由于耶稣会的规定,主教去世后其藏书归所服务的教堂所有,因此1757年索智能主教去世后,其藏书归入南堂图书馆,后来随着其他南堂藏书一起汇入北堂图书馆。据惠泽霖所编《北堂图书馆西文善本目录》,带有索智能主教印章的文献有93种^⑤。高华士统计为95种^⑥。

索智能主教旧藏书上也有一些题识,反映了书籍的递藏信息。例如带有索智能印章的《罗马通谕》^⑦是高怀义1731年在法国购买的(题识:“Comprado pa a Rezida de Chintimfu pello P. Carlos de Rezende em 1731 Por via de França.”);1739年高怀义与索智能交换藏书,例如带有索智能藏书章的《格里高利教令五书单篇注疏》^⑧,同时带有题识:“Comprado Pa a Rezida de Chim tim fu pello P. Carlos de Rezende em 1734.-Em 39 os comutad o

①但是1690-1735年担任澳门主教的嘉素(João de Casal, OSA, 1641-1735)神父的印章,则符合“左右各六个分成三行”的规矩。其印章亦为椭圆形,粗边框,印文为“D. JOAN-NIS DECASAL EPISCOPI MACHAOXNCIS”,中间图案为盾徽,上方为主教扁帽(其图版见 ARSI, Jap. Sin. 160, fol. 83, 彩图影印版见 Nicolas Standaert, *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pp. 105, fly leaf between pp. 326 and 327)。

②Ambrogio Calepino, *Septem linguarum Calepinus*, Patavii: ex typographia Seminarii, Apud Joannem Manfrè, 1731 (BT No.1180/3063)。此书题识为“Ignacio de Souza Vai p'oP. Polycarpo de Souza”。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3。

③Robert Smith, *A Compleat System of Opticks in Four Books: Viz. a Popular, a Mathematical, a Mechanical, and a Philosophical Treatise*. Cambridge, 1738. (BT No.4088/709)

④原题识惠泽霖神父已转录,高华士补全拉丁文缩写(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1)。

⑤H. Verhaere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 XIX.

⑥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1.

⑦*Magnum Bullarium Romanum...* Luxemburgi, Sumptibus Andreae Chevalier, 1730 (BT No. 1140/3412)。

⑧Manuel Gonzalez Tellez, *Commentaria perpetuain singulos Textus quinque Librorum Decretalium Gregorii IX...* Venetiis: Apud Nicolaum Pezzana, 1699 (BT No.1725/2087)。

mesmo R. P. Carlos de Rezende com o P Polycarpo de Souza por equivalentes couzas pa a Rezida de Chim tim fu”,即“1734年由高怀义为正定府住院登记—1739年高怀义为正定府住院与索智能神父等价交换”。

索智能藏书主要是教士和传教有关的内容,如神学、辩论、教会法和《圣经》(如图19),以及传教学和耶稣会史,数学、天文学的书各有一册,没有异教史、地理学和科学方面的书,惠泽霖认为“这种书很常见,这位耶稣会士要想看必可以在南堂找到”^①。

其主教印章使用年代为1740—1757年。

2. 汤士选主教圆印(1785—1808年)

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êa, 1751—1808),又名汤立亚山或汤立亚仙^②,1751年8月2日生于葡萄牙埃武拉(Évora),方济各会士。1773年12月2日起里斯本求学。在科英布拉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③。1782年前往北京,1783年抵达果阿,晋铎。1784年抵达澳门神学院。1808年去世。

汤士选主教的印章(图20)为18世纪末用象牙制造的,不同于前面所述耶稣会中华省的玉质印。印纽为两个微笑的小天使,一个天使站立,微笑看着另一个俯卧的天使,后者以左手支撑下巴抬头望天。印面图案(图21)为宽边帽和12根流苏的穗带,中间为一个十字架和一双交叉的双手,手上有类似基督受难时的伤痕,这是方济各会创始人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Assisi, 1182—1226)独特的灵修标志。印面正下方是一个浑天仪,靠下位置有其汉文姓氏“汤”,印文自左向右环形,为“EPISCOPVS PEKINENSIS DE ALEXANDER GOUVEA”,意即“北京主教汤士选”。

此外,法国遣使会士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 C.M., 1837—1905)记录的汤士选所用弥撒经书装帧式样亦与主教牧徽的构图相似。其中封底的装饰(图22)为盾形,顶部为宽边帽,然后是花冠,带12根流苏的穗带,盾形中间文字自左向右横书,6行,为“DER/ALEXAND/DE/GOUVEA,/EPISCO-

①H. Verhaere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 XIX.

②墓志图片由李蔚那(Aymard-Bernard Duvigneau, 1879—?)公布,碑文为“汤立亚山”(A. B. Duvigneau, C.M., “À propos de Monseigneur Alexandre de Gouvêa, évêque de Pékin (1782—1808)”,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No. 309(1939), pp. 320—321)。

③其传记参见 A. B. Duvigneau, C.M., “Apropos de Monseigneur Alexandre de Gouvêa, évêque de Pékin (1682—1808)”,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No. 309(1939), pp. 320—321. 汤士选主教有汉、拉、葡语手稿,藏于里斯本耶稣圣母教堂(Nossa Senhora de Jesus)。其中一封拉丁语、葡萄牙语的双语信已出版(Alexandre de Gouvêa, *Carta do Excellentissimo e Reverendissimo Bispo de Pekim, D. Fr. Alenandre de Gouvea, ao Il-lustrissimo e Reverendissimo Bispo de Calandro: sobre a introdução, e progressos do Christianismo na Peninsula da Coréa, desde o anno de 1784 até ao de 1797*. Lisboa: Na Nova Officina de João Rodrigues Neves, 1808)。

PUS/PEKIN”(汤士选,北京主教)。封面(图23)外部装饰与封底相同,盾形内部是十字架、交叉的双手,为方济各会典型的装饰图案。下方为一个类似浑天仪的球形装饰。

汤士选的牧徽特征凸显了其经历与身份。既有典型的方济各会灵修标志,又有天文学的象征(七门自由专业之一)——浑天仪(armillary sphere)^①,反映出汤士选在钦天监任职的经历。1800年起,汤士选主教任钦天监副,1806年升监正,直至1808年去世^②。故此印的使用时间应该在1785至1808年之间。

汤士选在北京任主教后开始收集图书。去世后,其藏书流入南堂图书馆。惠泽霖在编目时,根据汤士选主教的印章,著录了218部512册汤氏旧藏书^③。

惠泽霖整理发现,汤士选主教藏书中,法文书占了三分之一,且种类丰富,包括地理学、护教论、数学、教育学、艺术和手工业、化学、物理、医药、机械等,尤其突出的是“法国东方学”研究内容;与索智能主教的藏书倾向类似,主题最多的是与传教士相关的文献,且搜集的都是新近出版物^④,甚至有33种是他1783年离开葡萄牙以后出版的^⑤。惠泽霖评价道:“这是一份保护得最好的藏书,同索智能主教的书一样,装帧完好如初,在移交俄国教团保存之前,从未离开过南堂。”^⑥

根据高华士调查的档案和研究,汤士选离开葡萄牙之前,曾为远东之行搜集图书:他在1782年9月、12月先后致信葡萄牙埃武拉主教维拉斯-博阿斯(Manuel do Cenáculo Vilas-Boas, 1724-1814, 1770-1814年在位),咨询如何

①《西洋美術解読事典:絵画・彫刻における主題と象徴》,第133页。

②《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第61-62页。

③H. Verhaere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 XX. 按:高华士统计了215种(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5)。

④Johann Beckmann 认为其藏书都具有“现代性特点”(modern character) (“Bischof Alexander de Gouveia von Peking(1771-1808) im Lichte seiner Bibliothek”, *Euntes Doctete*, 21, 1968, pp. 457-479. 转引自 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6.)

⑤具体的书号统计,见 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6.

⑥H. Verhaere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 XX. 李国庆译注:《北堂书史略》,第28页。

准备藏书,尤其是“主教必备书”以及可以在法国购买的书籍^①。埃武拉主教曾建议他带各种《圣经》、教理与教会规矩、圣典仪式等相关的书籍^②。因此汤士选的藏书与埃武拉主教藏书重点比较相似^③。在出发之前,他从法国买了相当数量的书籍(现存215种藏书中,71种为里昂、阿维农等地的印本)^④。

埃武拉主教还在汤士选离开之前赠送了三部书给他^⑤。主教日记中记录了一份运书清单:包括萨西(Isaac-Louis Le Maistre de Sacy, 1613-1684)的十六卷本法文《圣经》、《蒙彼利埃要理问答》(*Catechism of Montpellier*)、西班牙版《莫雷利词典》(*Dictionnaire of Moreri*)、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汉语语法》(*Grammatica Sinica*, Paris, 1742)和《中国博览》(*Meditationes Sinicae*, Paris, 1737)、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Amsterdam, 1667)、《教会简史》(*Histoire de*

①J. Marcadé, “Frei Manuel do Cenáculo Vilas Boas, évêque de Beja, archevêque d’Évora (1770-1814)”, *Cultura Medieval e Moderna*, XII, Paris: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1978; F. A. Lourenço Vaz & José António Calixto, *Frei Manuel do Cenáculo. Constructor de bibliotecas*, Caleidoscópio: Casal de Cambra, 2006. 转引自 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6. 同页注 158 有信件译文。维拉斯-博阿斯主教的生平研究索引 (Maria Luísa Cabral, *Frei Manuel do Cenáculo: Contribuição para uma bibliografia passiva*), 见埃武拉公共图书馆网站 (Biblioteca Publica de Évora): <http://www.evora.net/bpe/cenaculo.htm> (2014 年 12 月 20 日检索)。

②这些通信主要保存在埃武拉公共图书馆和里斯本学院 (Academia das Ciências in Lisbon), 发表于 António Lourenço Vaz, *Os livros e as bibliotecas no espólio do D. Frei Manuel do Cenáculo: repertório da correspondência, rois de livros e doações a bibliotecas*, Lisboa, 2009, pp. 392-395. 转引自 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6。

③关于埃武拉主教藏书的研究,包括内容构成和相关分析,参见 Francisco António Lourenço Vaz, “As Bibliotecas e os Livros e na obra de D. Frei Manuel do Cenáculo”, Pedro M. Cátedra et al ed., *La Memoria de los Libros. Estudios sobre la historia del escrito y de la lectura en Europa y America*, Salamanca, Instituto de Historia del Libro y de la Lectura-Fundacion Duques de Soria, t. 2, Salamanca: Instituto de Historia del Libro y de la Lectura, 2004, pp. 483-498. 电子版见埃武拉公共图书馆网站: <http://www.evora.net/bpe/cenaculo.htm> (2014 年 12 月 20 日检索)。

④例外的一本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Jean-Jacques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ublique*, Paris: chez Casin, 1791. BT No. 623/2443)。

⑤埃武拉主教日记,藏于埃武拉公共图书馆,内容转写公布于 Francisco António Lourenço Vaz, *Os livros e as bibliotecas no espólio do D. Frei Manuel do Cenáculo: repertório da correspondência, rois de livros e doações a bibliotecas*, pp. 555-556. 高华士对转写的文字进行了修订,整理成具体的书目 (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7)。

l'Eglise en abrégé, Paris, 1712)等17种^①。惠氏目录著录汤士选旧藏中来自埃武拉主教书单的书籍,尚有《政治团体及其政府》等4种^②。汤士选抵达北京后,还曾给埃武拉主教去信,向他请求研究需要的书籍^③。这些通信资料,反映了北京与欧洲、果阿之间的书籍流动轨迹。

汤士选在出发前搜集的藏书,如1782年出版《水手每日指南》^④,后流入北堂图书馆。其题名页有两枚朱印,从上至下是汤士选主教圆形朱印和北京救世堂图书馆圆形朱印。汤士选的教会有关文献,值得一提的是一份18世纪的手稿^⑤,内容为1567至1606年的果阿会议摘录,共有五部分,从1567年第一届教省会议开始,1575、1585、1592、1606年共五次。应该是他抵达北京之后入藏的文献,对了解早期基督教在东方传教的历史有重要的价值。在稿本正文天头位置,带有汤士选的圆形朱印。汤士选在钦天监供职时使用的数学、天文学参考书,现存10余种^⑥。

3. 孟振生主教椭圆形印(1856-1868年)

笔者先是在徐家汇藏书楼藏《天主教奏折》中,找到两枚大小不同的孟振生(Mgr. Joseph-Martial Mouly, C.M., 1807-1868)主教的主教牧徽印章,分别钐于奏折卷端上方版框靠右位置(图24)、卷末日期(咸丰四年七月十四日)下方(图2)和卷中日期(咸丰四年五月初二日)下方(图25)。其形制为双边线,外阔内细,中央图案是主教盾徽,正中为十字架,并有光芒环绕,十字架下方的左右两侧为“S”和“V”。盾徽上方为主教扁帽,左右各垂10根穗带。盾徽下方为树枝装饰。钐于卷端和卷末者为小款,印文为拉丁文,分两部分,外环自

①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p. 97-98.

②J. Ch. de Lavie, *Des corps politiques et de leurs gouvernements*, 2nd ed., Lyon, 1766 (BT No. 416/1556); Jacques-Joseph Duguet, *Institution d'un Prince*, Londres, 1739 (BT No. 255/3042); Louis Debonnaire, *La regle des devoirs que la nature inspire à tous les homes*, Paris, 1758 (BT No. 224/232); C. A. de Martini, *Positiones de Jure Civitatis in Usus Auditorii Vindobonensis*, Vienna, 1768 (BT No. 2201/3645).

③信件公布于 Armando Nobre Gusmão, *Catálogo da correspondência dirigida a Fr. Manuel do Cenáculo Vilas-Boas*, 6 vols., Évora, 1944-1956. N.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p. 98.

④Thomas Haselden, *The Seaman's Daily Assistant, Being A Short, Easy and Plain Method of Keeping A Journal at Sea*, London: Printed for Mess. Mount & Page, 1782 (BT No. 4078/69).

⑤Concil Goano 1567-1606, 18th Century manuscript (BT No. 3600/3657). 共132页,包括3页前护页和16页后护页。手稿本身没有标题,只有装订匠制作的题目《果阿会议》(Concil Goano)。

⑥H. Verhaere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t' ang Library", p. XX. 李国庆译注:《北堂书史略》,第28页。

左向右环形,为“JOS. MART. MOULY. EPIS. FESSUL' VIC. AP. MONG. ADM. AP. PEKIN.”,即“蒙古宗座代牧区和北京宗座代牧区代牧弗苏郎^①主教孟振生”。内环印文自左向右环形,为“CONGREGATI MISSIONIS”,意即“遣使会”,整个印文意即“遣使会蒙古宗座代牧区和北京宗座代牧区代牧弗苏郎主教孟振生”。钐于卷中者为大款,印文亦分两部分,外环同小款,内环自左向右环形,为“CONGREGATIO PRESPVT. MISSIONIS”,意为“遣使会”。

徐家汇本在题名页的右下角钐有一枚圆形徐家汇耶稣会图书馆印章,其中央为“IHS”,其上方为十字架,下方为三颗钉子,外环上方为法文印文,自左向右环形,为“BIBLIOTHECA. MAIOR”,意即“大书房”;下方为繁体中文自右向左环形,为“徐家汇”(图26)。在序言页版框下方右侧,有一枚方形汉文繁体印章,印文分两行,右起为“耶稣会/中华省”(图2)。

继而,笔者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亦有《天主教奏折》同版藏本,且在卷端(图27)亦加盖孟振生主教章,位置相同,为小款朱印一枚,椭圆形,宽3.8厘米,高4.8厘米,印文同徐家汇本;而18叶a面的落款位置有孟振生主教大款朱印一枚,椭圆形,宽7.4厘米,高9.2厘米,印文亦为拉丁文,分两部分,形制与印文同徐家汇本。

国图本为平装,黑布封面,书脊贴皮质烫金印法文书名,自下而上印“MGR MOULY APOLOGIE-SUPPLIQUE 1858”,即“孟振生主教奏折1858年”,书脊上方有纸质书签,墨笔写“74”。题名页、19叶b面各有“北堂图书馆”汉文圆形蓝色印一枚,双边线,外阔内细,中间有五颗星,印文为繁体(详见下文“蓝色圆印”)。显然,国图本为北堂图书馆藏书。

除了上两种拉丁文椭圆形印章,国图本卷末日期(咸丰四年七月十四日)下方又有孟振生汉文椭圆形朱印一枚,宽3.8厘米,高4.8厘米(图28)。外框为回形花纹,外围文字为汉文,自右向左环形,为“弗苏郎监牧移^②于蒙古地面特授教宗恩命之副主教孟若瑟玛尔济亚国遣使会司铎”,中间为简化的主教冠,上有十字架,两边有穗带各一,中间盾形装饰,正中为十字架,下方自右向左分两行直书“圣味/增爵”,下方有花朵和枝叶装饰。

此奏折为咸丰五年(1855)香港天主堂刊本,内容是向清廷索还教堂及墓地。孟振生在自序中讲明刻本来由:“先经呈请直隶总督代奏,拟云‘折本虽好,不敢上奏,请大法国使臣代奏可也’。迨大法国使臣普专托江苏巡抚代奏。旋接回。”因“大清律例不许外国人奏事之故,无奈刻印折本,欲俾众人咸明白罗马京都天主教是系圣教,其教官来宾始末,均束身无过之人。即索还南北二堂同西人坟地”^③。书脊处的“1858”或是装订年代。

①“弗苏郎”,或作“福苏朗”(《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第55页)。

②“移”字存疑。

③孟振生:《天主教奏折》序,《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五册,第2136页。

1856年5月30日,北京主教区改作三个代牧区,即北直隶、直隶东南及直隶西南。时任蒙古代牧孟振生改任北直隶(北京)代牧,直至1868年去世^①。带有孟振生牧徽的《天主教奏折》,序言写明是为了索还教产而刊印传播,除发往教廷及各地住院外,北堂图书馆亦有存留。徐家汇本属于传播功能,因此无孟振生之汉文印。该本于20世纪40年代从上海徐家汇耶稣会图书馆流到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现保存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室^②。国图本则独有孟振生汉拉双语朱印,且书脊以烫金形式印书名,应为孟振生个人旧藏书,后收入北堂图书馆。

4. 张辅仁神父椭圆形印

国家图书馆藏1874年铅印本《遵主圣范》^③等书带有张辅仁印章。其为椭圆形蓝色印章,高约1.8厘米,宽约3.5厘米,外框线为齿状,印文分三部分,外环为法文,上半部自左向右环形,为“Tchang Paul C.M.”(遣使会士张保禄),下半部分自左向右环形,为“Card du Peit'ang”(北堂神父),中间为中文,自右向左横书“张辅仁”。封面以墨笔竖题“遵主圣范卷一二”及“为避静用”。

张辅仁,据《北堂传教士即往来人名录》载,1941年为“54岁”,则生于1885年,卒年不详,“蓟县人,传教主任”^④。1927年,张辅仁神甫、副堂李伯静神甫,从(宣化教区)来辛庄接任教堂神父。著有《董真福嘉俾厄尔致命》、《宗教丛谈》、《周年主日圣经》等^⑤。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主教传入文安县辛庄^⑥。《文安县志》载:“天主教,自前清光绪初年,境内始有之,其后渐盛,遂建教堂。掌教务者曰神父,亦名司铎,外国人居多,中国人间或有之”^⑦。光绪二十七年至民国二年(1914)是辛庄天主教开始发展时期,开教神父是田聿登(法国籍)、副堂马神父(中国籍),后由富成功(法国籍)神父、副堂康巴尔(中国籍)神父接任。辛庄教堂始建于1916年,由北京教区西什库总堂拨款,当年建成。1934年接修四间,并在大堂南边建一更衣室,另有客厅、住房、餐厅和伙房11间。后又建男女学校13

①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第36-39页。

②钟鸣旦、杜鼎克:《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序,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IV页。

③田类斯删定:《遵主圣范》四卷,清同治十三年(1874)北京救世堂刻本,书号:138510。

④《北堂传教士即往来人名录》1941年5月24日,抄本,第6页。井桂林、武振魁《辛庄天主教的由来与发展》载,其为宝坻县人(《文安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天津,1994年,第110页)。

⑤分别为北平北堂印字馆,1940、1943、1945年(雷强:《北堂印书馆1931至1951年刊印书目考》,《图书资讯学刊》第10卷第2期,2012年,第168、170、172页)。

⑥井桂林、武振魁:《辛庄天主教的由来与发展》,第106页。

⑦陈桢、李兰增:《文安县志》卷八《人民部·宗教志》,天津源泰印字馆,1922年,叶2a。

间^①。《文安县志》载设置学校的具体情况：“近数年来，颇重教育，堂内设有男女学校，所有课程，除讲教中外经典外，大致与国民学校相同。”^②

1940年，教堂曾作为军用仓库，1958年以后为管理区、公社机关所用，后又移交辛庄粮站做库房。1982年以后恢复教务活动。《津南辛庄乡志》载，辛庄天主教堂初建时，“设一法国传教士，他经常把宣传教会的书籍发放给村民……法国传教士回国后，高庄村刘教师在教堂里教书”^③。

据张辅仁生平，此书或为民国间流入北堂。

5. 吴司铎斐理伯方印

国图藏《弥撒祭义》一书^④，题名页左侧“司牧赵方济准”上方有朱文方印一枚，尺寸约为2×2厘米，双边线，外阔内细，印文为繁体篆字，分两行直书，为“吴司铎/斐理伯”。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夹有一页草片，上用铅笔以中文著录书目信息四行：“弥撒祭义/泰西艾儒略述/二卷一册/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三月重刊”。又以墨笔修订，将“述”改作“撰”，用箭头补充艾儒略的原名“P. Julio Aleni”，并勾去“三月”。草片下方有红铅笔写“1990”，左侧铅笔写“详”，右侧为打印书号“001871”，旁边为墨笔直书“编号”。这种草片与可确定是西湾子蒙古遣使会旧藏书的《天学举要》（原题《圣教总撮》）一样，故亦应属于北堂图书馆旧藏。

雷强统计的北堂印书馆刊印目录中，有一位与张辅仁同时期的吴司铎，著有《神修训言》^⑤，或即此印主。

6. 李君武方印

李君武印章为人名方章，汉文繁体，隶书，粗边线。印文为“李君武章”，笔者所见其印色有红色和紫色。其人名章和签名“Paul de Ly”有时同时使用，有时分开使用。在提善工作中，笔者见到包士杰《栅栏墓地与公教著作，1610-1927》一书^⑥封皮上有李君武印，右上方靠近书角，有墨笔签名“Paul de Ly”；题名首行右侧有“北堂图书馆”朱印（长条六边形，详后），左下方有“李君武章”，印色为紫色。题名页下方“PÉKIN”上钤方形朱印一枚，为“李君武章”。

另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神学词典》一书^⑦前护页上，也钤有李君武方形朱印，而主题名页的题名上方有蓝黑钢笔签名一行，为“Paul de Ly”，同时有

①井桂林、武振魁：《辛庄天主教的由来与发展》，第108-111页。

②陈桢、李兰增：《文安县志》卷八《民政部·宗教志》，叶2a。

③辛庄乡志编修委员会：《津南辛庄乡志》，天津，1994年，第271页。

④艾儒略：《弥撒祭义》二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书号：138938。

⑤《神修训言》，西什库遣使会印字馆，1940年（雷强：《北堂印书馆1931至1951年刊印书目考》，第168页）。

⑥J.-M Planchet, C.M., *Le Cimetière et les oeuvres catholiques de la Chala, 1619-1927*, Pékin: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28. 未编目。

⑦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Paris: Vivès, 1876. 未编目。

“北堂图书馆”朱印一枚。可以确定李氏藏书入藏北堂图书馆。无独有偶,在宁夏图书馆,笔者见到了此书的另外一册^①,印文及签名完全一致,可以证明他们都是共同的来源——北堂图书馆的李氏旧藏,并且都被北京图书馆接收,只是在二次分流中,后者入藏了宁夏图书馆。

李君武曾为北堂司铎。1946年《上智编译馆馆刊·作家动态》载:“李君武,前北平《铎声月刊》社社长。现任北堂主任,襄助田枢机处理教务,颇多改进;本馆成立,得李司铎赞助甚多。”^②1947年,李君武先是被任命为“北平教区副主教”^③,后当选“北平市参议员”^④。1951年《人民日报》载:“北京市天主教北堂主教及全体司铎李君武等二十三人,亦联名请求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西什库)仁慈堂。”^⑤北京西什库“仁慈堂”是法国天主教“仁爱会”于1862年创办的女孤儿院,从1946年起接受美国津贴。院长法籍修女雷树芳。北京解放以后,该院儿童尚有八百余名^⑥。1952年,李君武成为北京教区副主教^⑦。

四、北堂图书馆藏书印与藏书签

北堂图书馆有两种印章,一种是汉文长条六边形朱印,在北堂的汉文、西文书上皆有发现;另一种是前引国图本《天主教奏折》上所见的汉文圆形蓝印,与2013年笔者在宁夏图书馆所见到的形制完全相同。

1. 长条六边形朱印

王冰首先提到此印章。他发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熙朝定案》的首页右下角钤有“北堂图书馆”的“长方形小型记印”^⑧。笔者在嘉德2006年秋季拍卖会图录第0386号拍品《合校本交友论》上,亦发现钤有“北堂图书馆”章(图29)。其形制为长条六边形,高约1.5厘米,宽约3.5厘米。文字分两行,自右向左横书,为繁体隶书,“北堂/图书馆”。

在西文提善工作和检阅汉文古籍过程中,笔者又几次发现此印。在西文书和汉文古籍上皆有使用。前者,如1845年版《天主教会史》^⑨的主题名页右上

① *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T.VIII, Besançon, 1831. 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1666。

② 《上智编译馆馆刊》第1卷,1946年,第83—84页。李君武作为社长,照片见于《铎声月刊》1942年第1卷第1期,第2页。

③ 《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1期,1947年,第99页。

④ 《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6期,1947年,第517页。

⑤ 《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员会请求政府接管仁慈堂》,《人民日报》1951年11月30日,第3版。

⑥ 思华:《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人民日报》1951年11月30日,第3版。

⑦ 《和平会议代表在京举行联欢、访问和座谈》,《人民日报》1952年10月20日,第4版。

⑧ 王冰:《关于〈熙朝定案〉的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第87页注18。

⑨ René-François Rohrbacher,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église catholique*, T. 17, Paris: Gaume, 1845. 未编目。

方,即有此“北堂图书馆”朱印。后者如清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慈母堂铅印本《增订汇学读本》二卷^①,在题名页天头左侧钤有“北堂图书馆”朱印。提善工作中,笔者发现同版本《增订汇学读本》下集一册,其题名页天头位置亦有此印。提善所见之书残破严重,书芯下半部分虫蛀、碎化,只有上部分保存尚可。它们都应该属于北堂图书馆的汉文古籍,只是未列入善本。入藏国家图书馆后,也许因为品相之别而一部入藏普通古籍,另一部放在未编书中。

2. 蓝色圆印

在宁夏图书馆藏拉丁文《适用于学者和个人的评注本教会法》^②(神学部分)的第一册题名页上,笔者见到此印。2015年,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藏《天主教奏折》一书上(图30),亦发现同款印章。其形制为圆形,直径约为4厘米,边框为双线,外阔内细,印文分两行,首行自左向右横书“北堂”,下有“图书馆”三字自左向右环形,中间为五角星图案,字体为仿宋、繁体字。“图”字写法为“圖”,典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印章的特点。此印章是笔者所见所有北堂图书馆印章中,使用年代最晚的。

3. 正方形铅印藏书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北堂汉文古籍上还带有北堂图书馆的正方形藏书签,宽3厘米,高2.3厘米。文字分三行,自左向右横书,第一行和第三行为铅印,法文,为“Bibliothèque”、“du Pé-t'ang”,中间为墨笔手写索书号。如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七克》一书^③的题名页上(图31),看到索书号为“D.4”的藏书签,贴在题名页天头位置,与标题正中对齐。在此藏书签右侧,亦钤有“北堂图书馆”长条六边形朱印一枚。

笔者发现,部分带有此类藏书签的文献,同时带有培根女学校藏书印。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19年铅印本《辨学遗牍》^④的封面上,有培根女学校藏书印一枚,椭圆形朱印,高约1.5厘米,宽约3.5厘米。齿形边线,外阔内细,印文为中文繁体,分三部分,外环上部分自右向左环形,为“培根女学校”,下部分为“北京”二字,自右向左环形;中间自右向左横书“图书室”。外环印文之间以☆图案分隔。卷端页板框上方有“北堂图书馆”朱印一枚,法文藏书签一枚,黑色钢笔写索书号为“D.2”。亦为北堂图书馆旧藏。

培根女子学堂肇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四日(1908年5月3日),设在西安门内真如镜胡同,民国元年(1912)迁至永佑庙^⑤。1917年11月20日,培

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书号:121458。

②A. Vermeersch, S.I. & J. Creusen, S.I., *Epitome Iuris Canoici cum commentariis, ad scholas et ad usum privatum*, T. I, 1924. 未编目。

③庞迪我:《七克》七卷,清嘉庆三年(1798)刻本,书号:139407。

④利玛窦:《辨学遗牍》一卷,1919年铅印本,书号:136531。

⑤《调查北平庙宇碑记报告(续)》载:原“雨神庙”改“培根女学校”(《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三卷第一期,1932年,第2页)。

根女学校正式开办^①。8月中学部建立,地点在府右街1号(今自忠小学二分校所在地),1925年在教育行政部门立案。学校董事长是直隶清苑人、北洋将领马良,校长是英秋(字贞淑)。1927年,培根女学校中学部改名培根女子中学校。1939年9月学校停办。抗战胜利后培根女初中复校,1946年全校只有一个班,不久该校停办^②。

英校长是一位天主教徒,“终身没有嫁”,“她的寓所座落在西安门内真如镜十七号,那就是培根女子小学的故址”^③。英秋为“敛之先生女弟”,方豪曾在她的校长办公室见到了4册的抄本《性理真詮》,蒙英校长“慨然相赠”,“抄本每帙有蒙古区遣使会之拉丁文藏书印……知原属北堂图书馆,如何流入培根,不可知矣”^④。英敛之因为是天主教徒,家住在西什库教堂附近,得以查阅北堂藏书。例如蒙古遣使会旧藏《天学举要》1917年即经英敛之先生书写题识。而他个人所藏公教古籍颇多,如方豪曾述及陈垣借阅英氏藏书事^⑤。笔者怀疑培根女校藏书亦来自英敛之,可能是当时与马相伯一样“为教会书作序”^⑥,得以从北堂图书馆借出来的。方豪获赠此书是在1946年6月22日,则培根女校停办应该是在这个日期以后。

五、其他教堂及教会学校藏书印

1. 北京地区教堂及教会学校印

(1) 北京石门首善堂椭圆形印

此印形制为椭圆形,见于《至高无上的圣彼得及其继承者罗马教皇》一书^⑦,印色为紫色,高约4.5厘米,宽约3厘米,双边线,外阔内细,印文分两部分,外侧为法文,自左向右环形,“Séminaire de Lazaristes Pékin Cha-la”,意即“遣使会北京栅栏修道院”,中间为繁体中文,直书三列,自右向左为“北京/首善堂/石门”。

① 喻本伐编著:《中国幼儿教育史》,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252页。

② 李铁虎编著:《民国北京大中学校沿革》,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67-168页。

③ 孟丁:《培根学校四十纪念英秋校长八秩大寿》,《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6期,第512页。

④ 方豪:《考〈性理真詮〉白话稿与文言底稿》,《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第1887页。

⑤ 方豪:《明清间著译底本的发现和研究》,《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第17-18页。

⑥ 马相伯《重刊辩学遗牍跋》尾署“一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相伯马良题于北京培根女校”,同书还有1915年英敛之跋(利玛窦:《辩学遗牍》一卷,1919年铅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136531)。方豪亦曾记述此事:“民初,马相伯先生宦游北平,亦时寓培根。每为教会书作序,辄署培根名”(《考〈性理真詮〉白话稿与文言底稿》,《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第1887页)。

⑦ John Stewart McCorry, Gobert, *La Suprémie de Saint-Pierre et de ses successeurs les pontifes romains*, Paris: J. Lecoffre et Cie, 1856. 宁夏图书馆藏,未编目。

方豪指出,遣使会的财务管理机构在我国是以“首善堂”为名的^①。故此章应属于石门教堂的财务管理机构。石门教堂(又叫作马尾沟教堂、法国教堂、圣母修道院、致命圣教堂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因教堂前面有石碑坊而得名。1937年版《天主教北京》有其门前牌坊照片^②。这里原为万历年间杨姓太监别墅,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万历皇帝赐为利氏墓地,后即成为南堂传教士的栅栏墓地。20世纪初,这里设立了专门培养高级神职人员的神学院——文声学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尾沟教堂和栅栏墓地被日军占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尾沟教堂的外国教士离开中国,整个教堂由中国教会人士管理。1954年,教会将山字楼和口字楼出售给中共北京市委,被用作食堂和职工宿舍。1958年,教会将马尾沟教堂和整个栅栏墓地无偿赠与北京市委,今为北京行政学院(原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址^③。

(2) 北京(平)私立文声学院椭圆形印

此为椭圆形朱印。有两种,一为“北京/私立文声学院/阜成门外石门”;另一为北平时期所用,印文为“北平/私立文声学院/阜外石门”。皆为双边线,外阔内细,印文为繁体中文,分三行自右向左横书,印文之间以细栏线相隔。后者尺寸小于前者。

表2 文声学院两款章对比

大款	小款
京北 院学声文立私 门石外门阜阜	平北 院学声文立私 门石外阜

遣使会文声修道院,亦称北京文声神哲学院,1909年7月2日建于栅栏。中国遣使会总会长刘克明(Claude-Marie Guilloux, 1856-1924)神父访问栅栏,从北京宗座代牧林懋德(Stanislas Jarlin, C.M., 1856-1933)主教手中买了葡萄牙墓地和诸圣堂以东的一块地,建成一个方形四合院用作修道院^④。

1909年遣使会中国教省划分为南北两个教省,栅栏成为中国遣使会总会长驻地和遣使会新修道院所在地。自1918年起,修道院开始接受永平、天津等外地高级修士前来学习。1934年,栅栏文声修道院被传信部确认为地区性大修

①方豪:《谈教会楹联》,《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418页。

②Joseph A. Sandbaas S.V.D., “The Great ‘Stone Gate’ of Chala: An Emperor’s Gift”, *Catholic Peking!*,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1937, p. 10.

③杨靖筠:《北京天主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

④马爱德:《栅栏遣使会文声修道院的建立与历史》,《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第65页。修道院平面图参见该书第78-79页中间插图。

道院。遣使会士冯奎璋,为原《上智编译馆馆刊》编辑冯璘璋的兄长,曾在文声修道院任教,讲授哲学,指导圣堂音乐和典礼,兼任患病修生的调治^①。冯奎璋译著颇多,有《公教司铎通牒》、《毕嘉尔贞女小史》等译本出版,未出版者有《音乐小辞典》、《中国文学史概论》及编著《哲学辞典》、《中国哲学史讲义》,创办《铎声月刊》,被主教委为审查人。1942年去世^②。1954年,文声修道院关闭。

国外教会旧藏书流入北京私立文声学院的有以下几个:

A. 法国遣使会维希修道院椭圆形印

此印见于宁夏图书馆藏《伯絮埃全集》^③题名页右侧最下方,同页右侧自下而上还有“CONG^{TON} DE LA MISSION/M^{ON} DE VICHY”(遣使会维希修道院)椭圆形蓝黑印、“北京/私立文声学院/阜成门外石门”椭圆形朱印各一枚,左侧有“宁夏图书馆外文/藏书”长方形紫色印章一枚。

B. 巴黎遣使会椭圆形印

此印见于宁夏图书馆藏《蒲尔达罗全集》一书^④第5册,主题名页有四枚印章,分别是“北京救世堂”圆形朱印、“北平/私立文声学院/阜外石门”椭圆形朱印、“内修院”方形朱印和“巴黎遣使会”墨印(并未完全盖印上)。其中“内修院”朱印完全盖在“北京救世堂”朱印上,显然为注销之用,而“北平私立文声学院”朱印也压住“北京救世堂”一边,表明所属。其题名页上亦有“巴黎遣使会”墨印。

这提示我们,“北京救世堂”的印章时间可能晚于“巴黎遣使会”印章。而此书的流传轨迹是巴黎遣使会→北京救世堂→文声学院。至于内修院,似应为文声学院所设机构。需要指出的是,此《蒲尔达罗全集》后流入保定府教堂。其前护页上有椭圆形紫色藏书印,印文为法文,分两部分,外环自左向右环形印文“BIBLIOTHEQUE CENTRALE DU VICARIAT”,中间自左向右横书“PAOT-INGFOU”。意即“保定府宗座代牧区中央图书馆”。其上又钤“内修院”无边线红章(直书)。显然,“内修院”印章在此书上的作用是注销前章。方豪曾感慨清末民初“(北堂的)书库只是一大堆乱书而已。堂外的人,绝不容入内,而堂内神父们,则可以随便取阅,所以北堂的书,后来竟流传河北全省,至今未能‘回笼’”^⑤。北堂藏书遍布河北全省的情况,由印章亦可证之。

①冯璘璋:《黄风》,《公教学生》第2卷第3期,天津工商学院公教出版社,1942年,第41-42页。

②《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1期,1947年,第101页。

③Jacques Benigne Bossuet, *Œuvres complètes de Bossuet*, T. 16, Paris: Vivès, 1826. 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 1976。

④Jean Labouderie, *Œuvres complètes de Bourdaloue*, T. V, Paris, Noyon, Nouvelle édition, 1830. 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 1256。

⑤方豪:《明清间著译底本的发现和研究》,《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第17页。

C.遣使会教省栅栏图书馆椭圆形印

宁夏图书馆所藏的一部《法国史》^①,题名页有两枚栅栏教堂图书馆的拉丁文藏书印,形制为椭圆形,直径3厘米,印文分三部分,外侧上方自左向右环形:“DOMUS-PROVINCIALIS CONGRE[GATI]-MISSIONIS”,下方自左向右环形“CHA-LA”,中间自左向右横书“BIBLIOTHECA”,即“遣使会教省栅栏图书馆”(同图32)。

题名页中间,有一枚印章,形制为尖角椭圆,外环以珠饰,印章的图案以教堂、神父像和十字架构成,印文自左向右环形,为“SIGILLVM SOCIETĀTIS PĀTRVM/SARETI EDMVRDI PORTIRIĀCERSIS”,两段印文之间用十字架隔开。根据前文所述西方印章形制及印文,可知为主教印章(其人待考)。

题名页的两枚遣使会教省栅栏教堂图书馆印的布局是:一枚在中间右下方,一枚钤在前述尖角椭圆印之上,即注销。此页中间位置靠左,还有宁夏图书馆的方形紫印,印文分两行,自左向右横书,“宁夏图书馆外文/藏书”。

除拉丁文藏书印之外,栅栏教堂藏书印还有另一种形制,如《神圣罗马教会红衣主教圣文德全集》^②的第六卷题名页,有汉-拉双语椭圆形印,印文“DOMUS-PROVINCIALIS-CONGREGATION-MISSIONIS/*PEKIN-CHALA”(遣使会教省北京栅栏天主堂),同样自左向右环形,中间文字为“北京栅栏/天主堂”。与拉丁文印相比,双语印章上的拉丁文多了“PEKIN”(北京),并将中间的“BIBLIOTHECA”改为中文“北京栅栏/天主堂”。这种双语印章,亦有北平时期款,即将“京”改为“平”。

根据藏书印,流入栅栏图书馆的书籍,有以下几个来源:

第一,维希修道院。如宁夏图书馆藏《当代讲道百科全书》^③,第一、二册的题名页右侧,有维希修道院藏书印,之上加盖栅栏图书馆拉丁文椭圆章以示注销,该页左侧又加盖一枚栅栏图书馆拉丁文印章,以示入藏。

第二,巴黎遣使会。如宁夏图书馆藏《超自然秩序与神圣》^④,主题名页有巴黎遣使会圆形墨印,栅栏图书馆椭圆形蓝印两枚(一枚钤在巴黎遣使会印上)。

①M. Anquetil,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gaulois jusqu' à la mort de Louis XVI*, T. Cinquième, Paris, 1828. 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252。

②St. Bonaventure, Adolphe-Charles Peltier, Chanoine, *S. R. E. Cardinalis S. Bonaventurae ... Opera omnia*, T. Sextus, Parisiis: L. Vivès, 1866. 宁夏图书馆藏,未编目。

③*Encyclopédie de la prédication contemporaine: recueil de conférences, sermons, panégyriques, discours de circonstances etc*, I, Marseille: J. Mingardon, 1879. *Encyclopédie de la prédication contemporaine: recueil de conférences, sermons, panégyriques, discours de circonstances etc*, II, 1881. 未编目。

④Abbé Nicolas Gridel, *De l'ordre surnaturel et divin*, Nancy: Vagner, 1847. 未编目。

第三,“WULFILAICI”遣使会。椭圆形蓝黑印。见于宁夏图书馆藏《蒲尔达罗全集》^①,其题名页有三枚印章,分别是栅栏图书馆拉丁文蓝印,“WULFILAICI”遣使会蓝黑印和“宁夏图书馆外文/藏书”蓝印。其中“WULFILAICI”遣使会印为椭圆形,印文自左向右环形,为拉丁文“CONG. MISS. DUMUS. SO^m WULFILAICI”,中间是圣徒像,印文和图像间用椭圆形细线分隔。同版本的《蒲尔达罗全集》第三册,亦带有这三枚印章,且位置相同。显然是同一来源,流向则是“WULFILAICI”遣使会→栅栏图书馆。

栅栏遣使会神学院图书馆(Zhalan Vincentian Seminary Library)的藏书,一部分入藏北堂,后入藏国家图书馆、宁夏图书馆;还有一部分,仍然保留在北京教区神哲学院图书馆和天津主教府。据Anthony E. Clark于2011年的调研,北京教区神哲学院的西文书并没有编目,也几乎没有利用,因为该神学院学生都不懂法文^②。他在天津西开教堂的调研结果显示,自1951年西方传教士离开后,这批法国遣使会藏书留在了主教府,大约有5000多册,其中保留着完整的《北京公教月刊》杂志(*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和《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年刊》(*Annales des Franciscaines Missionnaire de Marie*),其藏书来自前天津法国遣使会中学——圣若瑟堂,还有一大批是法国遣使会教团的藏书,其中中文天主教文献最早的版本是清晚期印刷品^③。

栅栏图书馆藏书,有流入北京神学院者。如宁夏图书馆藏《现代中国》第一册^④,题名页有北京神学院紫色长方形印,印文分两栏,上栏自右向左横书“北京”,下栏繁体中文直书“神学院”,加盖在栅栏图书馆紫色椭圆形拉丁文印上。

(3)北京(平)方济堂椭圆形印和方印

一种为椭圆形紫印,双边线,外环带有齿状装饰,印文为拉丁文、中文,分两部分,上部拉丁文,自左向右环形,为“RESIDENTIA FRANCISCANA, PEIP-ING”,下方为中文,繁体,自右向左环形,为“北平:方济堂”。中间是方济各典型的图案:十字架和交叉的双臂。与遣使会“首善堂”类似,方济堂是方济各

①Louis Bourdaloue, *Oeuvres complètes du P. Bourdalou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Senlis, Tremblay, Paris, 1824. T. I. 宁夏图书馆旧编号1284。

②Anthony E. Clark, “Vincentian Footprints in China: The Lives, Deaths, and Legacies of François-Regis Clét, C.M., and Jean-Gabriel Perboyre, C.M.”, *Vincentian Heritage Journal*, vol. 32: Iss. 1, Article 3.(2014), p. 16.

③Anthony E. Clark, “Vincentian Footprints in China: The Lives, Deaths, and Legacies of François-Regis Clét, C.M., and Jean-Gabriel Perboyre, C.M.”, p. 17.

④Léon Wieger, S.J., *Chine moderne*, T. I, Hien-hien; Impr. de [Hien-hien], 1920-1932.作者直隶东南教区耶稣会法国神父戴遂良(1856-1933)。

会的财务管理机构^①。

国家图书馆另有一册《席勒全集》^②，原为“晋朔教区方济各会藏书室”的藏书，亦流入北平方济堂。该紫色椭圆形印章的形制为双边线，外阔内粗，印文为中文，繁体，分三栏自左向右横书，为“晋朔教区/方济各会/藏书室”。

另一种为长方形朱印。国家图书馆有一种《青年小说》^③的题名页，中央靠左铃有此印。其形制为长方形，双边线，外阔内细，印文为中文，分三列直书，繁体，右起为“北京/李广桥十八号/方济堂”。同时，该页右侧铃有椭圆形紫色方济堂拉丁文、汉文藏书印。

1945年，北平方济堂成立，主任为雷永明神父，有基本会员4人：李志先司铎、李士渔司铎、李玉堂司铎、刘绪堂司铎^④。该会主要工作包括编译《智慧书》（含约伯传、箴言、训道篇、雅歌、德训篇、智慧篇等六卷），并专攻希伯来文（每星期三小时或五小时不等）、希腊文（每星期二小时）、圣经神学（每星期一小时）^⑤。1945年8月，圣经学会在李广桥方济堂成立，雷永明组织整理《圣咏集》^⑥。1946年此书出版后，方豪特别撰文推荐，称它“是雷永明神父（Rev. P. Allegra O.F.M.）领导的圣经研究学会所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圣咏集共分五卷，都一百五十篇……节段分明，条目清晰。正文后则殿以注释……凡圣咏之名称、篇目、题名、作者、编纂、种类，以及圣咏集在旧约中之位置，神学上之价值，神修上之功能，和礼仪上之应用等，在总论中都有最清楚说明，使读者能于最短时间内，得到许多关于圣咏最有实用的智识”^⑦。

（4）北京（平）东堂圆印

东堂有两种藏书印，一种是英文、拉丁文、汉文合璧的圆形紫印，印文分三部分，外环上方自左向右，为“TUNG TANG CATHOLIC MISSION”，下方自左向右“PEKING”。中间以直线分为八个扇形，中文部分分两行，上方自右向左横书“北京”，下方自右向左横书繁体“东堂”二字，拉丁文为“IN/CROCE / EST SALUS”，即“十架救赎”。

另一款为北平时期所用，即将“京”改为“平”，“PEKING”改为“PEIP-ING”。

①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44页。另，普爱堂是圣母圣心会的财务管理机构。

②Friedrich Schiller, *Friedrich's von Schiller sämtliche Werke*, Augsburg: in Commission der Bolling'schen Buchhandlung, 1827. 未编目。

③Guy Desvaux, *Pinsonnette, roman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lon-Nourrit, 1919. 未编目。

④雷永明、李志先的介绍，见《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2期“作家动态”，1947年，第179-180页。

⑤《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4、5期合刊，1947年，第413-414页。

⑥“有人在翻译全部古经”，《益世主日报》第27卷第15期，1946年10月6日。

⑦《上智编译馆馆刊》第1卷，1946年，第63-64页。

宁夏图书馆藏《神父日常冥想》^①,前护页带有北平东堂圆形紫印及墨笔、朱笔题识,其中墨笔时间为1921年1月21日广州,朱笔签名及时间为:“Jo Fa Rice/ 21st Oct. '37”(1937年10月21日)。其题名页亦有北平东堂圆形紫印,以及“宁夏图书馆外文/藏书”紫印。

此外,在宁夏图书馆藏1846年版《蒲尔达罗全集》第三册^②,前护页和主题名上,有北平东堂拉丁文、中文印章的蓝印,并且在主题名页还有一枚椭圆形蓝印,印文为法文,分两部分,上方自左向右环形为“L'ABBE HENRI SAPELIER DE CAMBRAI”,下方为法文自左向右横书“BER (CHANOINE A CAMBRAI)”,即康布雷修道院章。其主题页右下角有签名“V. Jenso?”。

(5) 内修院方印

宁夏图书馆藏《善良》一书^③,题名页钤有“内修院”朱印。其形制与前文所述文声学院藏书上带有的“内修院”朱印完全一致。另外,宁夏图书馆藏《神学院学生手册》^④,题名页上除有“内修院”朱印外,其主题名页还有一个无边栏的椭圆形拉丁文紫印,分两部分,上方自左向右环形,为“SEMINARIUM MAJUS”,下方自左向右横书,为“PEKINENSE”,即“北京大修道院”。主题名页右下角有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紫色圆印。即属于北堂藏书。

2. 其他国内教堂印

(1) 山东兖州府天主堂长方形印

在国家图书馆藏1903年北京救世堂印《耶稣圣心圣月》一书的题名页页眉左侧有长方形蓝黑色印,高1.4厘米,宽5.4厘米,双语印文分三行,样式如下:

P. Rob. Sonderkamp SVD. Cath. Mission Yenchowfu, Shantung 山東兖州府天主堂
--

此书的编号形式与北堂汉文古籍相同,推测为北堂旧藏书。另,此书题名页右侧“北京主教樊”上方有墨笔直书“宋德刚”三字。

① John B Hogan, *Daily Thoughts for Priests*, Boston: Marlier, 1903. 宁夏图书馆旧编号146。

② Jean Labouderie, *Œuvres complètes de Bourdaloue*, T.III, Paris, Noyon, 1846. 未编目。

③ Jean Guibert, *La bonté, son prix, ses caractères, ses sources, ses contrefaçons*, Paris: Poussielgue, 1904. 未编目。

④ Louis Tronson, *Manuel du séminariste ou entretiens sur les principales obligations de la vie chrétienne et de la vie ecclésiastique. I, Sanctification des actions ordinaires*, Lyon, 1832. 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2644。

(2) 宣化堂方印

宣化堂有两种形制的藏书印,一种为长方形朱印,印文为法文、中文,分三部分,外环上方自左向右环形:“SUEN HOA FOU”,下方自左向右环形为“*BIBLIOTHEQUE*”,中间为中文,自右向左横书,为“宣化堂”。宁夏图书馆藏《红衣主教圣事著作》^①,题名页同时有此印和紫色圆形北直隶北堂图书馆印章。显然为宣化堂流入北堂者。另一种为方形朱印,单边线,楷体字、繁体汉文,单行直书,印文“宣化县天主堂”。

(3) 保定府宗座代牧区中央图书馆椭圆印

此为椭圆形紫色印,印文为法文,分两部分,外环自左向右环形印文“BIBLIOTHEQUE CENTRALE DU VICARIAT”,中间自左向右横书“PAOT-INGFOU”。意即“保定府宗座代牧区中央图书馆”。在宁夏图书馆所藏《圣佛朗索瓦全集》一书的前护页上有此印,并且其上又钤“内修院”无边线红印,主题名页上则有黑色巴黎遣使会藏书印、北京救世堂红色圆印,其上钤“内修院”无边线红印,“北平/私立文声学院/阜外石门”椭圆形朱印。

(4) 嘉兴修道院圆印

宁夏图书馆藏《圣经教课书》^②,题名页上有此印,圆形,直径为3厘米,单边线。印文为拉丁文,自左向右环形,分两部分,外侧为“EX LIBRIS SCOLASTICORUM CONG. MIS.”,中间为“KIA-SHING”,上方有五角星装饰,意即“嘉兴遣使会修道院藏书”(同图33)。

据《遣使会在华传教史》^③,1902年,遣使会中国省会长步师嘉(Louis Boscat, 1848-1904)创立初学院及神学院,1904年都止善(Paul Pie Dutilleul, 1862-1929)神父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先在舟山,后在嘉兴^④。起初修院运行顺利,后由于北方的修士逐年减少,遣使会打算在北方再成立一座初学院。于是在北京筹设新的栅栏修院。1911年遣使会在中国南方与北方各设一省:北省包括北方的四个代牧区,栅栏为省会院。南省包括浙江的两个代牧区及江西的三个代牧区,初学院在嘉兴。抗战胜利后,1946年嘉兴文生修院改为江西、浙江二省的总修院,遣使会的神哲学院留在嘉兴文生修院,初学院则迁往嘉兴乍浦。

① Louis François Désiré Édouard Pie, *Oeuvres sacerdotales du Cardinal Pie: choix de sermons et d'instructions de 1839 à 1849*, T. 1, Paris: H. Oudin, 1891. 宁夏图书馆旧编目号 2022.

② Jacques-Paul Migne, *Scripturae Sacrae cursus completes*, Parisiis: Apud Editores, 1839. 未编目。

③ 樊国阴著、吴宗文译:《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台北华明书局,1977年,第644页。

④ 陈若瑟:《浙江嘉兴遣使会史略》(四)、(五),《信德报》2011年9月15日(总第458期)、10月20日(总第462期)。以下内容参见该文。

1947年,江西和宁波大修院停办并入嘉兴文生修院。1949年春,嘉兴文生修院停办,遣使会士前往菲律宾马尼拉。

结 语

从上述西文印章的使用年代来看,耶稣会 IHS 圆印的时间最早,其次是法国遣使会方印,再次是北京救世堂图书馆圆印、蒙古遣使会圆印,然后是北直隶北堂图书馆长方形印、西湾子宗座代牧区圆印,最后是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圆印。

中文印章和北堂法文藏书签的使用似乎应始于 1938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北堂图书馆编目之时。尤其是法文藏书签的形制已经为近代图书馆藏书签的样式,且中文印章在汉文古籍、西文书上皆有应用。

从印章信息来看,流入北堂图书馆的近代国外机构藏书大部分来自法国,包括法国巴黎遣使会修道院、维希遣使会修道院、法国公共教育部等;国内则主要是栅栏图书馆、文声学院、首善堂等在京教堂和修道院图书馆,以及宣化、保定、兖州、嘉兴修道院等京外教堂和修道院的图书馆。这些教堂图书馆皆属于遣使会。而方济堂等非遣使会藏书也有少数流入北堂图书馆的。在北京教区服务的神父旧藏书也流入北堂,如张辅仁、李君武等神父之旧藏书。

这些藏书印和藏书签信息,反映了近代以来传教士图书馆藏书的管理情况,以北堂书而言,藏书印的使用因教区变化而变化,如从北京救世堂,到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再到北京教区,印章形制发生了变化;同时带有耶稣会、蒙古遣使会到西湾子教区的藏书印情况,则体现了书籍管理者的变化。北京教堂藏书随着北堂、南堂的关闭,流入蒙古遣使会、西湾子教区,成为其藏书的一部分,后随着教产的归还,又流回北堂。当然,在每次流动中,书籍都有分流现象。北堂书在 1939 年开始系统整理,作为图书馆收藏标识的“北堂图书馆”汉文藏书印和法文藏书签开始应用,甚至在汉文古籍上同时使用。贴在西文书书脊下方的黑色书签,说明它们曾竖着插架存放;贴在汉文古籍卷端的纸质藏书签带有图书馆名和馆藏分类号;西文文献题名页下书角的压角印和特别钤在 99 或 199 页上的印章显然是为了防盗;这些都反映了北堂图书馆以近代图书馆模式管理书籍。

由此可见,印章是北堂书重要的外观特征,其不同形制和印文,反映了不同时期因教区变化或书籍流动而造成的归属变化的历史。而一些主教的印章,亦成为判断藏书归属的重要依据,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附图：



图 1^① 耶稣会中华省印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



图 3^③ 约 1616 年左右
耶稣会日本教省印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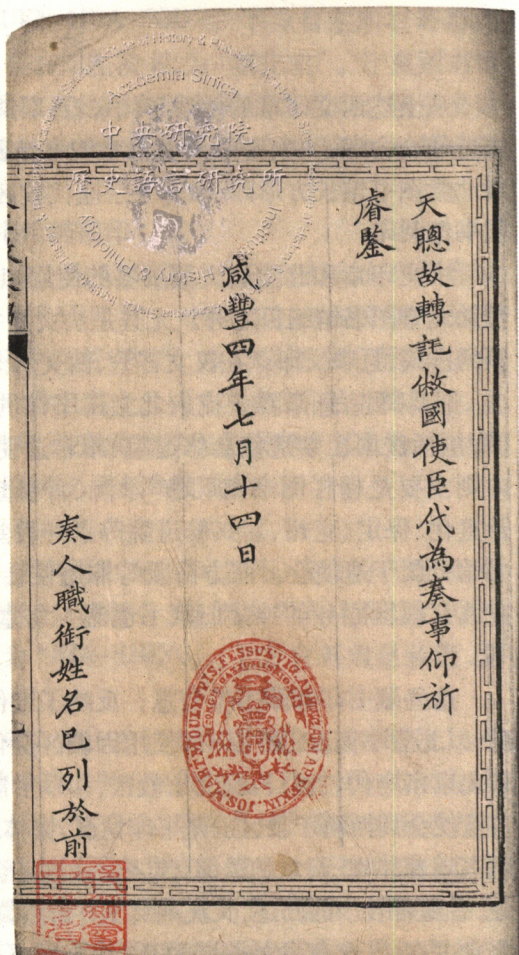


图 2^② 《天主教奏折》，“耶稣会中华省”印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①Nicolas Standaert, *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Travelling Books, Community Networks, Intercultural Arguments*, Bibliotheca Institutii Historici S.I., vol. 75,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2, p. XVIII, Figure 3.

②孟振生：《天主教奏折》卷末，《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五册，台北利氏学社，1996年，第2173页。

③N. Standaert, *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p. XIX, Figure 4, No.6.



图 4^① 约 1619 年左右日本教省印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



图 5^② 约 1620 年左右日本教省印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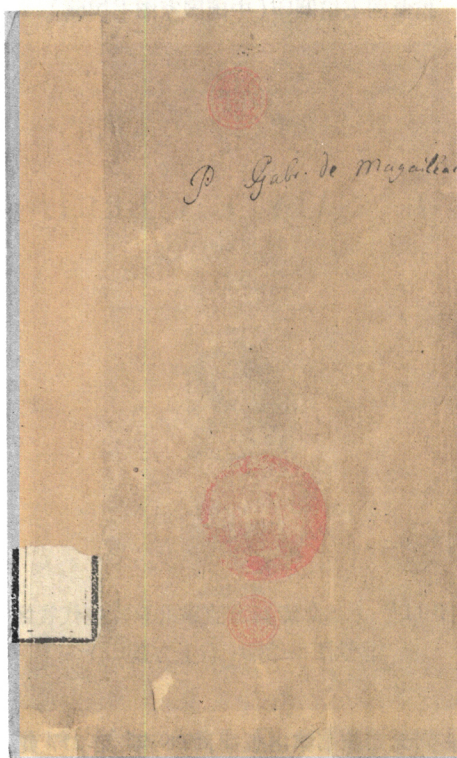


图 6 《复活论》封皮, IHS 圆印
三种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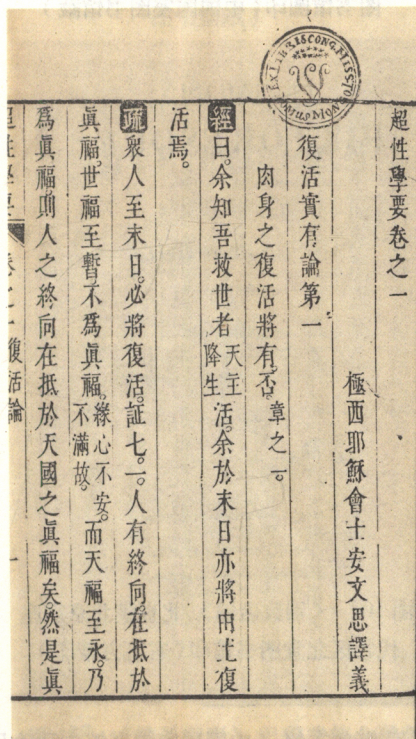


图 7 《超性学要》卷端, 蒙古遣使会
圆形墨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①N. Standaert, *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Figure 4, No. 3, p. XIX.

②N. Standaert, *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Figure 4, No. 2, p. XIX.



图 8^① 《论星盘》题名页,北京救世堂图书馆圆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 9^② 《天球运行论》题名页,北京救世堂图书馆圆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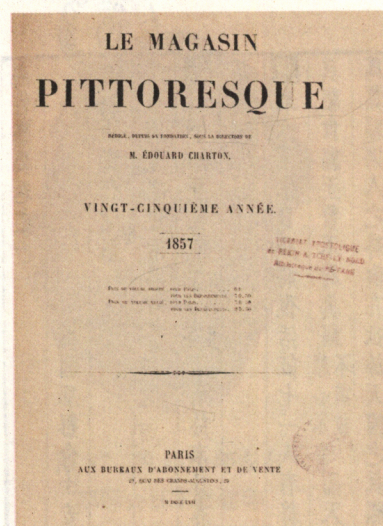


图 10^③ 《别致店铺》，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印（右上方紫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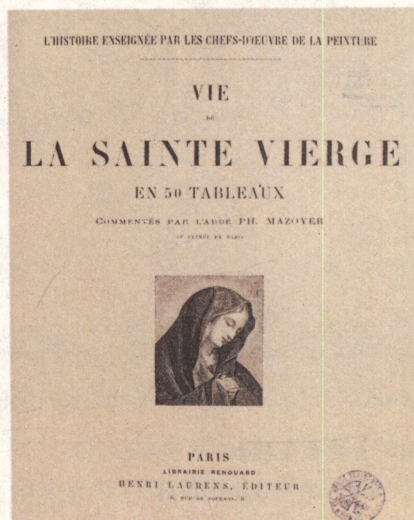


图 11^④ 《圣女传》，北直隶北京宗座代牧区
北堂图书馆印（右上方蓝印）

①任继愈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国家图书馆编：《翰墨流芳：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第280页。

②《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第 215 页；《翰墨流芳：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图录》，第 277 页。

③④嘉德 2006 年秋季拍卖会图录《“一千部”西文书籍——从摇篮本到〈北堂书目〉》，第 85、116 号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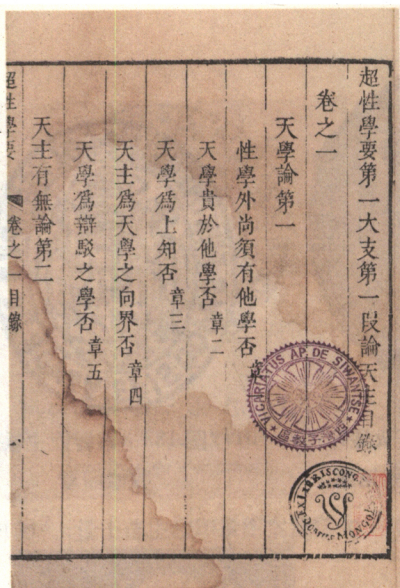


图 12 《超性学要》，蒙古遣使
会、西湾子教区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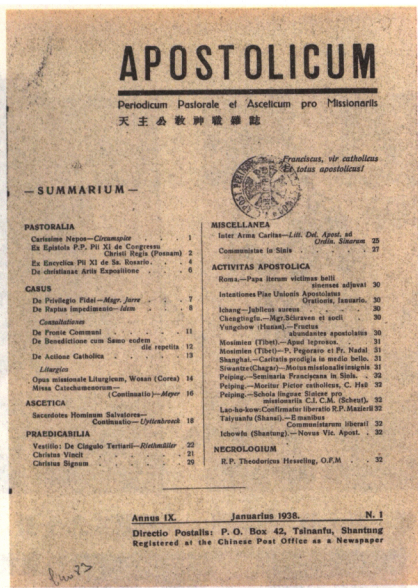


图 13^① 《天主教神职杂志》，北京宗座
代牧区北堂图书馆印（右上紫印，中国国家
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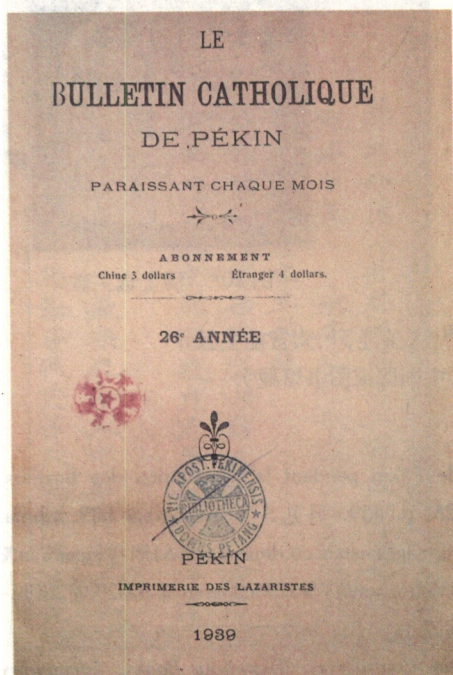


图 14^② 《北京公教月刊》，北京宗座代牧区北
堂图书馆印（中间蓝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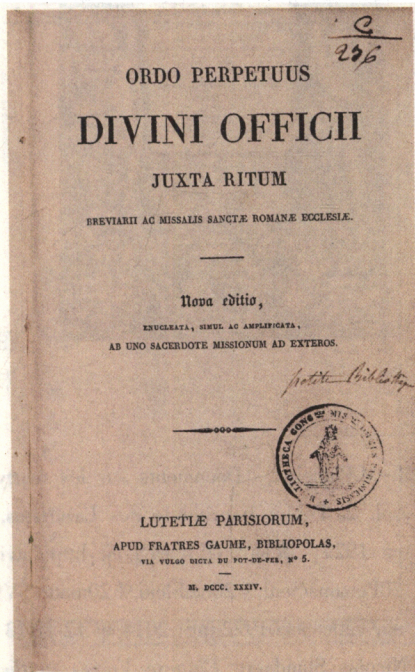


图 15^③ 《神圣职责》，巴黎遣使会墨印

①Apostolicum, N. 1, Tsinan: Catholic Mission Press, 1938. 书号:H/A72/1700。

②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Pékin: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39. 书号:H/B94/1850。

③嘉德 2006 年秋季拍卖会图录《“一千部”西文书籍——从摇篮本到〈北堂书目〉》，第 113 号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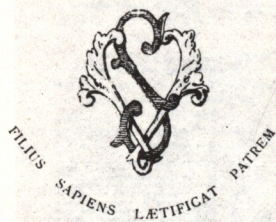


图 16^① 中国遣使会
徽章和格言



图 17^② 范礼安火漆印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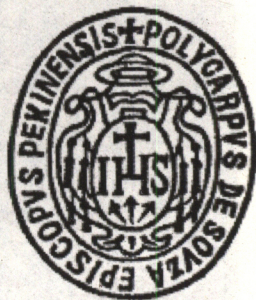


图 18^③ 索智能主教
牧徽印章



图 19^④ 《圣经》^⑤, 索智能主教
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 20^⑥ 汤士选主教印

- ①J.-M.Planchet, Documents sur les martyrs de Pékin pendant la persécution des Boxeurs, vol. 2, Pékin: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25, p. 459. 另见 S V Monogram 029, China, ca 1922, 遣使会图片档案库: <http://stvincentimages.csteis.cti.depaul.edu:8181/Vincentian%20Persons/Seal,%20emblem,%20motto/SV%20Monogram/SV%20Monogram%20029,%20China,%20ca%201922.jpg> (2014 年 12 月 13 日检索)。
- ②Nicolas Standaert, *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Travelling Books, Community Networks, Intercultural Arguments*, Figure 4, No.1, p. XIX.
- ③《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第 19 页。
- ④《翰墨流芳: 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图录》,第 282 页。
- ⑤Juan de Mariana, Manuel de Sá, Petrus Lانسelius, *Biblia Sacra Vulgatæ Editionis Sixti V. Pont. Max.*, Antverpiæ: ex officina Plantiniana Apud Balthasarem Moretum, et Viduam Ioannis Moreti, et Io. Meursium, 1624. (BT No. 1022/1206)
- ⑥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No. 309(1939), p.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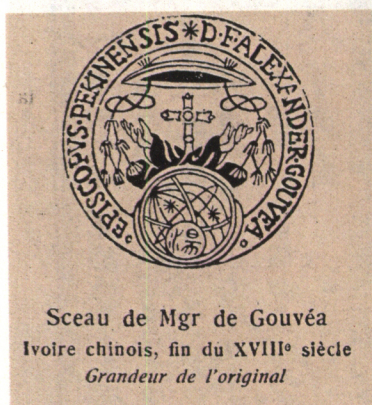


图 21^① 汤士选主教印章图案及印文



图 22^② 汤士选主教所用弥撒书封底



图 23^③ 汤士选主教所用弥撒书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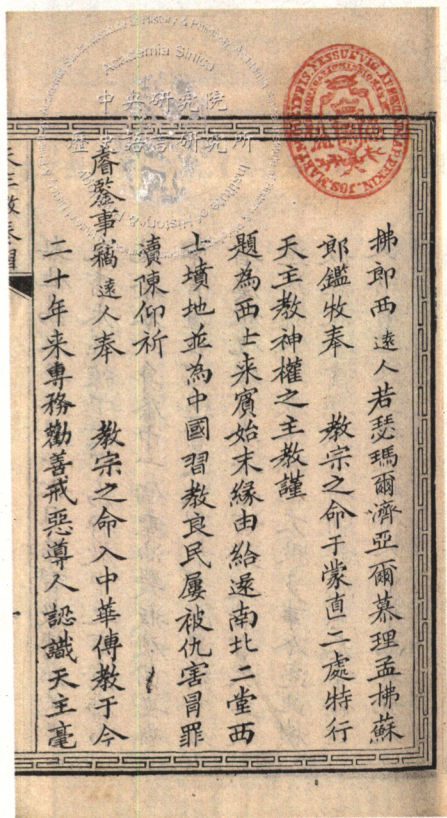


图 24 《天主教奏折》，孟振生主教印（小）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图 25 《天主教奏折》，孟振生主教印（大）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①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No. 309(1939), p.322. 印文可参见《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第 19 页。

②③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No. 309(1939), p.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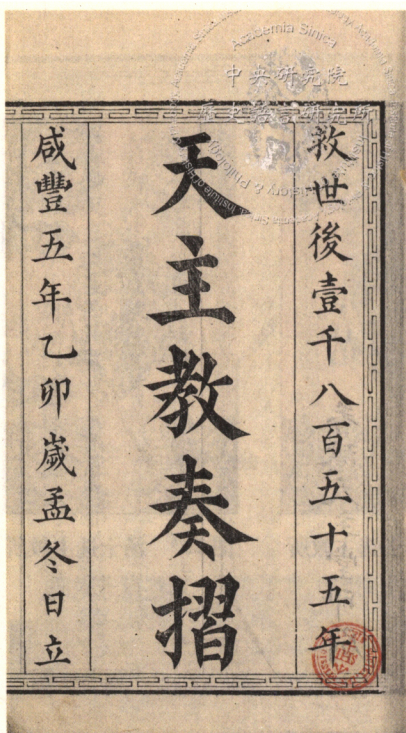


图 26 《天主教奏折》，徐家汇耶稣会图书
馆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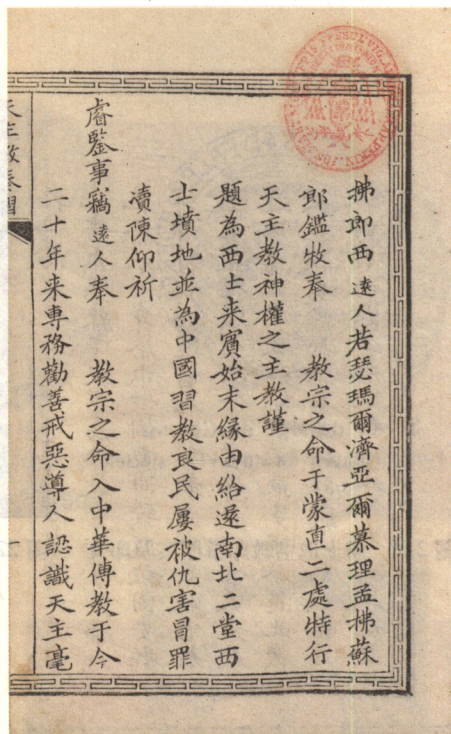


图 27 《天主教奏折》，孟振生主教法文章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 28 《天主教奏折》，孟振生主教汉文章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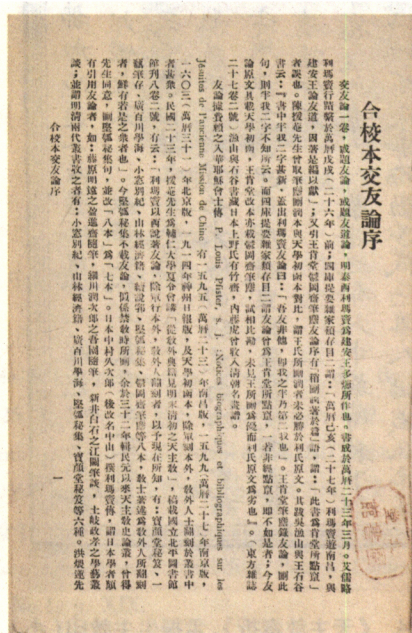


图 29^① 《合校本交友论》，北堂朱印

①嘉德 2006 年秋季拍卖会图录《“一千部”西文书籍——从摇篮本到〈北堂书目〉》，第 0386 号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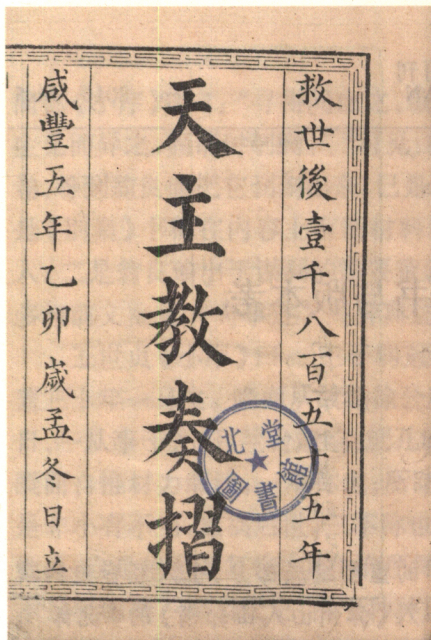


图 30 《天主教奏折》，
北堂蓝色圆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 31 《七克》，北堂图书馆方形法文藏
书签、北堂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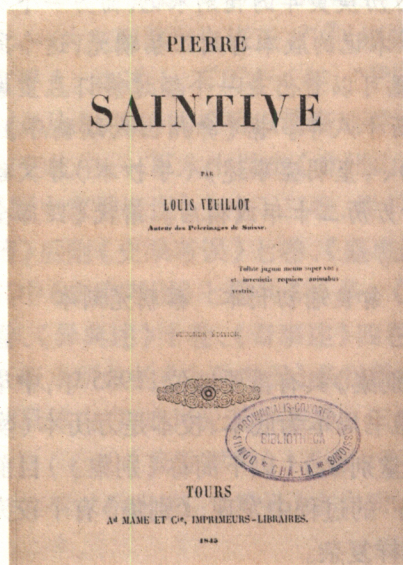


图 32^① 遣使会教省栅栏图书馆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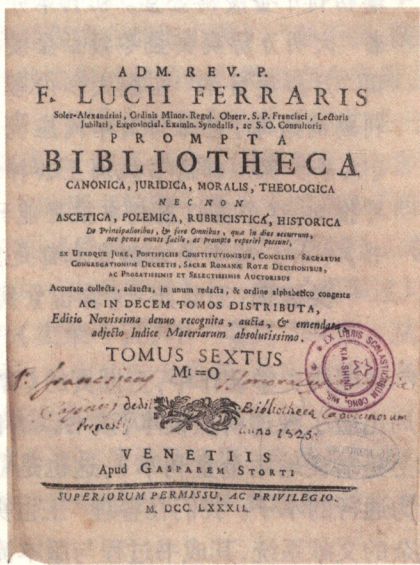


图 33^② 嘉兴遣使会修道院印
（右上方紫印）

【作者简介】赵大莹，博士，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

- ①嘉德 2006 年秋季拍卖会图录《“一千部”西文书籍——从摇篮本到〈北堂书目〉》，第 92 号拍品。
- ②嘉德 2006 年秋季拍卖会图录《“一千部”西文书籍——从摇篮本到〈北堂书目〉》，第 38 号拍品。